

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

巫仁恕**

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晚明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的特點。首先，我們可以看到晚明的旅遊活動呈現高度的商品化與市場化的傾向，這可以從旅遊相關書籍的刊行、旅遊交通與食宿的商品化、導遊以及套裝行程的出現等現象反映出來。

其次，晚明旅遊風氣的興盛已經從上階層蔓延到社會大眾，由此可見旅遊活動的普及性。此外晚明的旅遊活動強調的是舒適性與娛樂性，這可以說是另一個特點。

再者，晚明興盛的旅遊消費算不算是過度的奢侈浪費，一度成為人們爭論的議題。然而也在此時有人由旅遊消費出發，重新檢討傳統奢侈的經濟觀念，正視旅遊消費所帶來的正面作用。

晚明出現許多旅遊論述如「雅俗」、「遊道」、「遊具」等等，有許多是士人階層所創發，特別是以文學著名的文士；在這些旅遊論述中反映了他們將旅遊與身分地位聯繫在一起，並且極力想塑造新的旅遊品味，以區分其與大眾旅遊不同的心態。

在結論中，筆者將晚明的旅遊與同時期西歐的旅遊活動略作比較，以重新定位中國的旅遊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從前述的比較與分析可

* 本文係院內主題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子計畫之研究成果，初稿曾於本所舉辦之「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11月）中宣讀，惠承多位與會學者多方指正，獲益良深，謹此致謝。修訂與送審過程中，復蒙兩位審查人的詳閱與指正，特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3年5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年8月14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知，就旅遊業(tourism)與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在前現代發展而言，中國實不亞於西歐。而且晚明的旅遊消費文化的確在相當程度上，與現代性的消費文化特點是相吻合的。

關鍵詞：旅遊、晚明、消費、風氣、品味、現代性

一、前言

「旅遊」一詞在中國古籍中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時，梁朝詩人沈約在題為〈悲哉行〉的詩中寫道：「旅遊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到了唐代「旅游」一詞開始被大量運用。從此一詞的出現也反映中國旅遊的悠久歷史。¹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是旅遊，而非旅行；就定義而言，「旅游」或「旅遊」一詞與「旅行」一詞最大的差異是，後者重點在「行」字，遊覽並不是它的主要目的；而旅遊的重點是在「遊」字，遊覽就是它的最終目的。

旅遊活動在中國的歷史出現雖早，但是到了明代，尤其是到晚明時期，旅遊風氣可說是盛極一時。過去已有一些研究談及晚明旅遊的風氣，但是對旅遊活動的消費文化並無完整與深入的分析；²當時留下來的「遊記」，過去多成為文學史家討論小品文的素材；³另外還有一些涉及旅遊的山水畫作，則是藝術史家的研究對象。⁴前此筆者曾撰文針對晚明士大夫階層，探討

¹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 2-3。

² 參見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漢學研究中心、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0 年 4 月；陳建勤，〈明清時期的旅遊消費及其支出——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消費經濟》，期 4(2000)，頁 63-65；陳建勤，〈論「游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月刊》，期 4（2000 年 8 月），頁 64-68；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史原》，期 19（1993 年 10 月），頁 131-171。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2000）；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卷 20 期 1（2002 年 6 月），頁 101-128。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74-182.

³ 陳萬益，〈晚明小品文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期 3（2000 年 9 月），頁 1-44。

⁴ 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4(1997)，

其旅遊風氣興起之因、旅遊活動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旅遊的具體實踐與旅遊論述的複雜性等問題。⁵

本文不再侷限於「士大夫」階層，⁶而是嘗試以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作為探討對象，並擬從四個角度：商品化與市場化、普及性與娛樂性、消費觀念、風尚的形成與身分認同等，來觀察晚明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的特點。在結論中，筆者將晚明的旅遊與同時期西歐的旅遊活動略作比較，以重新定位中國的旅遊文化在歷史上的地位。

又因為大部份的遊記內容所記載的旅遊活動多是江南地區人們的旅遊活動，而旅遊的範圍也以江南地區為主，所以本文的討論也以江南為中心。

二、晚明旅遊活動的商品化與市場化

（一）旅遊相關書籍的刊行

晚明出現許多各式各樣與旅遊有關的出版品，最常見到的就是大量的遊記。據學者周振鶴統計明人文集中遊記的數量顯示，明代前中葉的遊記並不多，至嘉靖年間(1522-1566)漸漸增加，萬曆(1573-1620)以後則是大量出現。⁷ 文集中除了遊記以外，旅遊詩更是不勝枚舉。單行本的遊記與旅遊詩也大量問

頁 185-222；James Cahill, "Huang Shang Paintings as Pilgrimage Pictures," in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246-292.

⁵ 拙作，〈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2002年10月。

⁶ 本文所謂的「士大夫」採用宮崎市定的看法，除在特定的論述中會作嚴格區分之外，泛指官職經歷者（包括在職官員與退休鄉紳）與未入仕而持有功名身分者（包括舉人、監生、生員等）。參見宮崎市定，〈明清蘇松地方的士大夫と民衆〉，收入氏著之《アジア史研究》，輯4（東京：岩波書店，1964），頁321-360。「士大夫」一詞在明代較常是指涉上述的第一類人，但在文獻上也常見包括第二類人的定義，如〔明〕林雲程修，沈明臣等纂，萬曆《通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10（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萬曆六年刻本重印，1996），卷2，〈風俗〉，頁47a。

⁷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頁2-3。

世，通常會以某地「遊草」或某地「遊記」為書名，甚至還有將各地著名旅遊勝地由古至今相關的遊記與旅遊詩總集成冊的書，如吳郡都穆(1458-1525)編的《遊名山記》與王世貞(1526-1590)編的《名山記廣編》等書皆是。

這些遊記對晚明的旅遊風氣有實際的影響，尤其對士大夫的影響更為直接，有些例子顯示讀者在閱讀完遊記後毅然決然地走向旅遊的道路。如王思任(1575-1646)在〈紀遊〉一文中提到他對於「台蕩之勝」本已有很高的興趣，所謂「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最後決定去旅遊的動機就是「偶讀駕部張肅之《台游草》，遂投袂而起，屐及于壺皇，裝及於寢門之外，舟及於五雲之滸。」⁸由此可見《台遊草》就不只是文學作品而已了，它還可以說是一種旅遊導覽手冊，刺激了人們想去旅遊的神經。⁹

後來還有圖文並茂的旅遊書，這個風氣起自萬曆三十七年(1609)輯刻的《新鐫海內奇觀》一書，內有全國各地風景名勝一百三十餘幅(附圖一)。此書的編輯方式開後來諸名山記有圖之端，出版後大受歡迎，成為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一本書。另外，當時流行的山水畫作也同樣具有類似旅遊導覽的功能，這些山水畫作常以「臥遊冊」作為名稱，虞淳熙(1553-1621)的〈五岳勝覽序〉就說這種圖文並茂的畫冊比起遊記更具有吸引力：

近世有《岱史》、《岱宗記》、《五岳記》、《游名山記》，而王恒叔太僕有《游岳圖文》，附以異跡，質之與乘桑、鄺諸家言，一日臥游，未能周五岳矣，況復騁亥步莊運，專勝遊婚嫁之後哉！¹⁰

再者，如晚明喜歡蒐藏山水畫作的何良俊(1506-1573)，在《四友齋叢說》書中談到他之所以蒐藏山水畫作，就是因為一般的名山遊記只是文字，不如圖

⁸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紀遊〉，頁645。
⁹ 也有士大夫無法親身旅遊而以閱讀遊記來過乾癢，如沈愷常聽越中人士談及西湖之美，但平生卻無法一遊，成為其憾事，遂取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讀之。見沈愷著，〈小西湖記〉，見《環溪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92(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影印出版，1997)，卷3，頁33a。
¹⁰ [明]虞淳熙，〈五岳勝覽序〉，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頁203。

文並茂的山水畫精彩，他說：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煙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¹¹

而他自云老年蒐集山水畫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他想要旅遊的欲望：「正恐筋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臥遊之意也。」¹²這就是他以為的「臥遊」樂趣。¹³故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臥遊冊與山水畫作也可以說是一種旅遊導覽手冊，它們提供了人們旅遊景點時的一種視覺印象，頗似現代風景畫或明信片，讓士大夫在旅遊時會注意某些景觀。

除此之外，晚明刊行的多種路程書在記載各條路程後面，也都會附帶介紹當地的名勝古蹟。就以天啓六年(1626)文林閣唐錦池刻印刊行的《士商類要》一書為例，在記錄各路程後附有許多旅遊景點的介紹，如卷一「徽州府由景德鎮至武當山路」條之後，附有武當山各宮殿景致的說明；又同卷「蘇州由杭州府至南海路」條後，附有普陀山景致的說明；其它還有茅山、九華山、東嶽泰山、北京八景等介紹。¹⁴另外，明末刊行由徽商黃汴編纂的《天下水陸路程》書中，在各路程後也附有名勝古蹟的介紹，如卷七「杭州逾路瀾溪至常州府水」條後，介紹了蘇州府內寒山寺與吳王墓的古蹟。同卷「浙江至天台雁蕩山水陸」條後，大談雁蕩山峰巒泉水之景，並云：「天下峰巒未有奇於此者。」¹⁵換言之，這類路程書不只是作為客商長距離活動的參考書，同

¹¹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8，〈畫一〉，頁257。

¹² 同前註，頁255。

¹³ 由此可見晚明流行的寫實山水畫風和旅遊風氣興盛不無關係。有關晚明旅遊風尚與山水畫的關係參見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頁185-222；James Cahill, "Huang Shang Paintings as Pilgrimage Pictures," pp. 246-292.

¹⁴ 該書收入楊正泰編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248、254等諸處。

¹⁵ 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太原：山西出版社，1992），頁206、243。

時也具有旅遊手冊的功能。又因為它們的讀者群更廣，所以其影響層面更勝於士大夫所寫的遊記。

上述幾大類與旅遊有關的出版品中，雖然文集與單行本的遊記、旅遊詩並非是商業性的出版品，但是總集式的遊記、圖文並茂的旅遊書以及路程書等，多少都是有市場需求的商業性出版品。

（二）旅遊交通的商品化

晚明旅遊時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端視旅遊的地點而有所不同。¹⁶只要花錢都可以租到或雇到旅遊時所需的交通工具，可見其商品化的程度。登山的交通工具是以人力擔負的肩輿為主。肩輿使用的時間很早，¹⁷不過明代中葉以前用在旅遊方面並不普及，可是到晚明，肩輿或轎子用在風景區作為登山的交通工具則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在晚明的遊記與小說中隨處可見這類記載。若比較明初與晚明的山水畫作，也可以發現畫中人物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很大的變化，從明初騎馬、驢甚至騎牛，到晚明的畫中人物則都是乘肩輿或轎子。在許多風景名勝的山腳下，還可見成群的舁夫在休息等待客人（參見附圖二、三、八）。¹⁸

無論是轎夫或舁夫幾乎都是從當地人中雇募，所以譚元春(1586-1637)在〈游玄嶽記〉一文中就記載了他旅遊時所見到的當地舁夫的特有風俗。¹⁹至於雇轎或肩輿的費用，在明代後期的小說如《型世言》、《警世通言》與《金

¹⁶ 有關於明人旅遊活動中的交通方式，張嘉昕前引文第五章有較全面的介紹，本文則集中焦點在商品化的旅遊交通方面。

¹⁷ 如楊守陳在〈遊招寶山記〉已記載景泰年間與諸人同遊招寶山，「日方生，五人皆肩輿出城，白沙碧草彌路，抵麓下輿，攝衣躡石磴，迤北數步，轉而東。」見〔明〕楊守陳，〈遊招寶山記〉，收入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冊4（上海：中華書局，1924），卷18，〈浙江省〉，頁22。

¹⁸ 有關轎子在晚明普及的情形參見拙作，〈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8（2002年12月），頁1-69。

¹⁹ 〔明〕譚元春，〈游玄嶽記〉云：「自寒河七日抵界山，山始眾。是時方清明，男婦鬢生柳枝，淒然有墳墓想。至迎恩觀，舁人忽下肩，向井東叩首，復舁上肩去，肅肅悻人矣。」該文收入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20，頁545。

瓶梅》等書中多有記載，大約是 5 錢至 1 兩 5 錢；但是若要買馬當坐騎的話，一般馬匹價格約在 35 兩至 80 兩之間。兩相比較之下，當然雇夫抬轎要比養馬乘騎來得划算。²⁰

如果是遊名湖大澤的話，通常都是乘船。但是游船的形式與名稱頗多，崇禎《松江府志》就提到當地舟楫的變化：

初有航船、游山船、座船、長路船，今為浪船、樓船、朱欄、翠幕、淨如、精廬，游人往往召客，張燕其中，遠近通行。²¹

原本當地舟楫種類不多，後漸漸多樣化，而且多是為旅遊之用。在李日華(1565-1635)的日記中也記載了許多不同名稱的「舫」，包括了「小舫」、「雪舫」、「湖舫」、「酒舫」與「畫舫」等等，可惜並無進一步有關形制的紀錄。²²又例如王叔承在〈武林富春遊記〉中，描寫到西湖上游船的情景時也講到許多不同名稱的游船，包括了湖船、遊敖、畫艦或舴艋等等。²³還有所謂的「樓船」，據明人考證明代西湖湖船仍是沿用宋元時代之制，大小差異不大，只有樓船特別大：「不過船上加樓，極綵繪之華。」²⁴又據虞淳熙在〈浮梅檻詩序〉中的形容：

湖舟具有樓名，而實無樓。春水登之，宛如天上作也。……於是實為樓，閉戶開筵，卻宛如閨中坐矣。啟牖而榜人窺我閨人，牖因不時啟，不知有西湖也。²⁵

汪道昆(1525-1593)在遊洞庭山時遇雨至，「諸客避樓船中」，²⁶可見樓船用於

²⁰ 參見拙作，〈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頁 9、14-15。

²¹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崇禎三年刻本影印，1991），卷 7，〈風俗〉，頁 34a。

²²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 5，頁 352。

²³ [明]王叔承，〈武林富春遊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冊 4，卷 18，〈浙江省〉，頁 63。

²⁴ [明]錢希言，《桐薪》，收入《松樞十九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序刊本影印），卷 3，〈湖船〉，頁 17a-b。

²⁵ [明]虞淳熙，〈浮梅檻詩序〉，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 208。

²⁶ [明]汪道昆，〈遊洞庭山記〉，見[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15-19（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崇禎刊本影印，1990），卷 4，

旅遊者不假。在形制上，較小的游船則稱之為「小艇」，如李流芳(1575-1629)在遊焦山後仍回味無窮，遂想「當擇春秋佳日，買小艇，襍被宿松寮閣上十日夕也償夙負。」²⁷游船最常見的稱呼是所謂的「畫舫」（附圖四），泛指「一載優伶簫鼓、一載酒筵」的游船。²⁸

通常這些船都可以在風景區雇覓，至於價格恐怕不菲，就像袁宏道(1568-1610)在〈荷花蕩〉一文中描寫蘇州葑門外的名勝荷花蕩，在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時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雇覓一空。遠方游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²⁹又如田藝蘅（田汝成之子）在〈重遊寶石山記〉云，其曾於春天二月與友人遊杭州西湖，「而欲買舟，則舟價騰踊而名舟且盡發，其所留者率衣袈敝舫耳。」³⁰

（三）旅遊食宿的商品化

從晚明的遊記中可以看到一旦形成景點的地區，大多有可供遊客租賃食宿的地方，無論是城內或郊外，最常見可供食宿的包括有酒樓、旅店、旅館等等。在晚明的小說中有關這類場所的描述也非常多。

在城外郊區的景點，也有腦筋動得快的商人在臨湖的地方建起酒樓，如浦昉君(1594-?)的〈游聖明湖日記〉記其遊杭州西湖時，「初七日，午後微有霽色，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湖酒樓，群飲於上。」³¹這類在風景區附近設店的例子不算少，可能在當時很普遍。如費元祿在《鼉采館清課》一書中

〈山〉，頁 16b。

²⁷ [明]李流芳，《檀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卷 8，〈遊焦山小記〉，頁 10a。

²⁸ 據明人錢希言的考證，兩舟相並曰：「舫」，當時人一概混淆，凡船皆稱舫。見[明]錢希言，《戲瑕》，收入《松樞十九山》，卷 3，〈舫〉，頁 22a-b。

²⁹ [明]袁宏道，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4，〈荷花蕩〉，頁 170。

³⁰ [明]田藝蘅，《香宇續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明嘉靖刊本景照），卷 13，〈重遊寶石山記〉，頁 8b-9a。

³¹ [明]浦昉君，〈游聖明湖日記〉，收入朱劍心選注，《晚明小品選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頁 333。

曾記載他於春夜間遊某湖，稍入近市，過一「酒家」，索飲數杯，陶然就醉，接著就乘月縱遊，甚至醉於一洞壑中，醒時已天明。³²

即使在荒郊野外，也會有簡陋設備的酒店供旅客飲食，如戴澳〈五洩紀遊〉云：「次早，舍舟登筍輿，行二十里至平闊，飯於野店。」³³又如胡胤嘉的〈寒山記〉說：「趙凡夫廬墓，自觀音山左折十餘里，折窮而累垣如峽，峽窮而酒帘招搖，其旁板扉雙合，排扉而入，凡夫小宛堂也。」³⁴原來這裡「酒帘招搖」的是一個座落在山峽間的小酒店。

城市內也有許多旅店，在明朝前期城市內已有供逆旅客人住宿的客棧，但是設備與招待似乎都不怎麼高級，而且所費不貲。如宋濂(1310-1381)的〈李疑傳〉中描寫南京的情形：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俯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眊眊（按：側目而視）未瞑，即與棄之而奪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眾，其勢致爾也。³⁵

可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後，南京城內可供住宿的選擇更多了，而且設備更加富麗堂皇。如王士性(1547-1598)《廣志繹》中形容秦淮河的景象云：

水上兩岸人家，懸樁拓梁為河房、水閣，雕欄畫檻，南北掩映。夏水初闊，蘇、常遊山船百十隻，至中流，簫鼓士女闐駢，閣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覲為景。蓋酒家煙月之趣，商女花樹之詞，良不減昔時所詠。³⁶

到明中葉以後城內的旅館應是頗為普及的，如李日華在其日記中曾記載他至

³² [明]費元祿，《蠹采館清課》，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14冊4（台北：新興書局，1988），卷上，頁5a。

³³ [明]戴澳，《杜曲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明崇禎年間刊本景照），卷8，〈五洩紀遊〉，頁11。

³⁴ [明]胡胤嘉，〈寒山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冊4，卷15，〈江蘇省〉，頁36。

³⁵ [明]宋濂，〈李疑傳〉，見《朝京稿》，收入《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4，頁1708。

³⁶ [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兩都〉，頁24。

城市後，「余以山人裝、竹兜潛行，不敢過諸豪貴交，人亦無從物色。余早息旅館。」³⁷

（四）導遊與套裝行程的出現

有些景點因為地勢險要，特別需要導遊的帶領，如在太湖中的包山，又稱苞山或洞庭山，山上有林屋洞，姚希孟(1579-1636)曾遊至此卻不敢深入，因為「洞口沮洳（按：低濕之地），望之黝黑。無炬，無嚮導，結束（指行裝）未備，不可以游。」³⁸從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到當時有雇用樵夫為導遊的情形，如謝肇淛(1567-1624)在〈遊黃山記〉中寫道：「募開道者，得二樵夫，與之斧斤，命輿人持襍被，或負鑊及糗脯，且行且急。」³⁹由此可見，晚明的旅遊活動中應該已經有導遊的出現，可是從當時人的遊記看來尚未能肯定有專業的導遊出現，而是由一些人「兼差」，例如舁夫、船夫也會充當導遊。李維楨(1547-1626)遊南京時，友人建議去遊莫愁湖，「舟子識其處者前導，兩人攜而步至湖邊。」⁴⁰再者，當地的僧道因為山居已久，於各處地形勝景皆瞭然在胸，所以也常充當導遊。如程嘉燧(1565-1643)遊齊雲的天門虎崖時，就有道士來相迎，並且為他們「指虎崖之勝」；⁴¹又如王臨亨(1548-1601)宦遊至韶州時，在遊歷古蹟甚多的觀音山峽山寺時，有「寺僧導余上，入涵碧堂小坐，啓右扉而北度石橋，過綠雲樓」；「至此則面面芙蓉，高插雲漢，石徑窮而遊人卻步矣。」⁴²

³⁷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2，頁131。

³⁸ [明]姚希孟，《循滄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251（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張叔籟陶蘭臺刻清閩全集本影印，1996），卷1，〈包山寺記〉，頁3a。

³⁹ [明]謝肇淛，《小草齋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76（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刻本配鈔本影印，1997），卷8，〈遊黃山記〉，頁4b。

⁴⁰ [明]李維楨，〈遊莫愁湖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冊4，卷15，〈江蘇省〉，頁11。

⁴¹ [明]程嘉燧，〈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收入施蜃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書店，1984），頁208。

⁴² [明]王臨亨，《粵劍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志遊覽·紀行〉，頁97。再如黃山僧協助晚明士大夫登臨黃山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參見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頁144-145。

在一些著名的旅遊進香名勝地，有更多且完善的附屬設施，舉凡住宿、交通、娛樂等問題都可以一次解決。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張岱在〈岱志〉一文中所載泰山景點的附屬相關設施：

離州城數里，牙家走迎，控馬至其門。門前馬廄十數間，妓館十數間，優人寓十數間。向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為一店之事也。到店，稅房有例，募轎有例，納山稅有例。客有上中下三等，出山者送，上山者賀，到山者迎。客單數千，房百十處，葷素酒筵百十席，優僕彈唱百十群，奔走祇應百十輩，牙家十餘姓。合計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滿二萬。山稅每人一錢二分，千人百二十，萬人千二百，歲入二三十萬。牙家之大，山稅之大，總以見吾泰山之大也。嗚呼泰山！⁴³

從文中的描寫看到，在山下就有馬廄、妓館與優人寓所十數間；在此凡是租房、雇轎或納山稅都有規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顯示當地還有類似現代的旅行社服務業——牙家，專門提供完整的招待客人的相關設施，凡是住的、吃的、娛樂的、跑腿的全都有。上了山頂後還有人招待避寒和飲酒：「頂上牙家有土房，延客入向火。余寒顫不能出手，熱炙移時，方出問頂」；「出紅門，牙家攜酒核洗足，謂之接頂。夜巨戲開筵，酌酒相賀，謂朝山歸。」⁴⁴這種情形很類似現代旅遊業的套裝行程(package tour)。

三、晚明旅遊風氣的興盛與普及

晚明旅遊風氣的興盛已經從上階層蔓延到社會大眾；旅遊的活動從精英分子的宦遊與士遊，普及到大眾旅遊。以下先略述這兩方面的發展，再探討這些現象的特點。

⁴³ [明]張岱，《聊齋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卷2，〈岱志〉，頁67-68。

⁴⁴ 同前註，頁71-72。

(一) 晚明士大夫的旅遊

1. 宦遊與士遊

晚明士大夫喜歡旅遊的風氣從一些他們對自己性格的描述就可以看到。例如袁中道(1570-1623)自稱：「天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於雜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⁴⁵鄒迪光談到自己的喜好也說：「余故孱弱，少所濟勝，不能游，而獨好游，當余□屬之未解拮据，鞅掌蒿目焦心，一食而停匕箸者再，而所過佳山水，未嘗不游。」⁴⁶鄭材也說：「余性愛游往，雖仕宦不廢，登臨後，以老親在堂，不敢遠出，既而讀禮廬舍，游道已矣。」⁴⁷或者是對某些人的形容，也常見喜好旅遊的描寫，如陳繼儒(1558-1639)在〈閩游草序〉中，描寫他的朋友周公美的性格時也說：「未四十，敕斷家務，有子孝且賢，不遺世事經懷，公美日與群從讀書食酒，爲名『山游』。」⁴⁸再如朱國禎(1558-1632)自稱「生平好游」，又提到當時士大夫中稱善遊者，莫過於王士性，「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⁴⁹

中國歷代統一的帝國時期因爲幅員廣大，地方官通常都會派任到離原籍很遠的地方，因而所謂「宦遊四方」是早已有之。但是到了晚明，「宦遊」的意義漸漸轉向休閒旅遊。明代地方官最重要的行政工作不外乎錢穀與刑名，錢穀稅收方面是例年特定時候的事情，而刑名則是日常的行政工作。官員在「無訟事」的時候就是他們旅遊的時機。如天啓年間(1621-1626)任山西

⁴⁵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10，〈王伯子岳游序〉，頁460。

⁴⁶ [明]鄒迪光，《鬱儀樓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158（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出版，1997），卷36，〈遊吳門諸山記〉，頁1a-b。

⁴⁷ [明]鄭材，《悅偃齋文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刊本），卷10，〈游上方山記〉，頁10a。

⁴⁸ [明]陳繼儒，〈閩游草序〉，收入黃卓越輯，《閑雅小品集觀——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冊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頁260。

⁴⁹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台北：廣文書局，1991），卷10，〈己丑館選〉，頁8b-9a。

布政使的文翔鳳在〈游青泥澗吉祥寺雜記〉即云：「四月某日，又校射于郊堂，無訟事，日腳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⁵⁰又如王臨亨過潮陽時，回憶起友人稱當地金城最勝，於是「讞畢無事，同兩別駕遊金城，顧而樂之，謂柱史之言不謬也。」⁵¹

晚明不只是有上層士大夫的「宦遊」，就連中、下層士大夫的「士遊」也非常興盛，舉人就是提倡士大夫旅遊風氣的主力之一。當時江南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黃省曾(1490-1540)了。蘇州人黃省曾，個性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1538)進京應科考時，正巧友人田汝成（嘉靖五年[1584]進士）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他便激動地輟裝往遊，盤桓累日而不應考。據說他還自號「五岳山人」，田汝成便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⁵²

至於生員喜好旅遊的例子亦是常見，如公安派作家丘坦，字坦之，號長孺，湖廣麻城人。萬曆三十四年(1606)舉武鄉試第一，官至海州參將；善詩，工書，喜遊歷。當其仍是諸生時，就與袁氏兄弟交好。袁宏道任吳縣知縣時曾寫信給他，邀其遊江南太湖：「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按：袁宏道自稱）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⁵³只有生員身分的松江名士陳繼儒亦喜好旅遊，他自稱喜遊於方內，潛若參龍，俛若拱鼠矣，而倘佯於山水之間，微露本真性情，所以遊伴嘲之為「老猿孤鶴」；甚且「每欲勅斷家事，一了名山之緣。」⁵⁴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從明末清初才女的詩文著作中顯示婦女常會隨夫家宦遊；此外，官宦士人婦女於持家之餘出遊取樂，業已成爲當時的風氣。⁵⁵

⁵⁰ [明]文翔鳳，〈游青泥澗吉祥寺雜記〉，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339。

⁵¹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4，〈志遊覽·鳳城遊紀〉，頁98。

⁵²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17，〈山遊〉，頁16a。

⁵³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5，〈丘長孺〉，頁208。

⁵⁴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13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影印，1995），卷6，〈紀遊稿引〉，頁17a。

⁵⁵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2. 士大夫旅遊的實踐

士大夫實際旅遊時先要選定旅遊地點，從士大夫所撰作的所謂「遊記」的文體來看，對他們而言，最能稱得上值得「遊」的不外是名山、大湖與園林三大類。⁵⁶一般選擇作為旅遊地點的名山通常還具備有幾個條件：包括了有古蹟、古剎、奇泉、名石、大觀寺廟或是宗教聖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名山大澤常是著名的旅遊景點，但是因為距離遙遠，旅費高且風險大，所以能夠到達賞遊的人並不多，當然更不用說偏遠的不知名景點，就像費元祿解釋其家鄉鉛山縣雖有美景卻無人知曉的原因：「要以地僻，故未經驗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⁵⁷反而是距離近的景點因為交通方便，所以遊人眾多。對當時經濟與文化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區而言，能夠從事長程旅遊，即所謂「壯遊」的士大夫仍是少數，大部份的士大夫仍多只是從事短距離的旅遊，目的地是江南附近的名山，就如同楊循吉(1456-1544)所云：「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跡者耳，至於幽僻奇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有能及游者焉。」⁵⁸

而江南因為士大夫與文人薈聚，留下許多該地區的遊記，也使得江南大城市及其附近形成了許多具有全國性知名度的旅遊勝地。單從《吳縣志》中所蒐錄描繪該地區的遊記數量驚人，便可知江南勝景聞名的由來。謝肇淛就以蘇州虎丘為例云：「山川須生得其地，若在窮鄉僻壤，輪蹄絕跡之處，埋沒不稱者多矣。如姑蘇之虎丘，鄒之大嶧，培塿何足言？而地當舟車之會，

期 3 (1995 年 8 月)，頁 30-41。

⁵⁶ 明代旅遊的景點很多，限於篇幅在此略而論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學家的「悟道處」也會成為晚明士大夫的旅遊勝地，如顧憲成在萬曆十五年行經道州，聞周敦頤悟道於離州治約四十里的「月巖」，隔日遂偕往。抵達後待友人指稱某處為濂溪先生故里時，他激動地感到「翩翩神往」！又稱：「生平傾慕先生，如飢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故目若為之加明，耳若為之加聰，心若為之加爽。」見〔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8，〈遊月巖記〉，頁 342-345。

⁵⁷ 〔明〕費元祿，《龍采館清課》，卷下，頁 3a。

⁵⁸ 〔明〕楊循吉，《燈窗末藝》，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43（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1997），〈西山游別詩後序〉，頁 336。

遂令遊詠讚賞，千載不絕。豈亦有幸不幸耶？」⁵⁹

交通工具對旅遊來說是一大要件，晚明士大夫很重視所謂的「遊具」或「濟勝之具」，指的就是旅遊時的交通工具與攜帶的器具，旅遊的目的地可否到達就要看遊具或濟勝之具是否備全。從晚明文人的遊記也可以看到他們很重視旅遊時交通工具的舒適性，如張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提到他遊蜀的經驗，當他由三峽而下湘江時，兩岸桃花盛開，放舟千里間，「良一快遊」。然而遺憾的是：「但舟制不佳，四櫓搖撼，板木皆動，舟中之人不能穩坐，況咿啞之聲聒耳，對面語不相聞，較他處舟航迥異。」⁶⁰他在意游船的不舒適而使遊興大減。

至於旅遊需要攜帶的器具有哪些呢？我們可以從士大夫在旅遊前廣發給親朋好友的邀請函內容中，看到這些器物的名稱。如張岱(1597-1685)的〈游山小啓〉是如此寫著：

凡游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氈、茶點、盞箸、香爐、薪米之屬，每人攜一簋、一壺、二小菜。游無定所，出無常期，客無限數。過六人則分坐二舟，有大量則自攜多釀。約○日遊○舟次○右啟。某老先生有道。司會某具。⁶¹

信中細錄了出遊時需攜帶的東西，包括了食物，如茶點、二碟小菜、一簋一壺茶酒與薪米之屬；以及旅遊的器具，如坐氈、盞箸、香爐等等。由其所列之器具顯示並不完全是旅行用的必需品，而多有茶酒等奢侈消費品。

士大夫即使在旅遊時對飲食仍然非常注意，⁶²尤其像酒與茶更是助興的重要飲料，就如同姚希孟所云：「斗酒尤不可少」；明中葉已見此現象，如徐

⁵⁹ [明]謝肇淛，《五雜俎》（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4，〈地部二〉，頁88。

⁶⁰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西遊紀〉，頁40-41。

⁶¹ [明]張岱，《瑯嬛文集》，卷2，〈啓·游山小啓〉，頁101。

⁶² [明]胡廣，〈游陽山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冊4，卷15，〈江蘇省〉，頁26。描寫作者遊覽時有流僧曰：「漁鱗魚者，斤可十八錢，買而及釜，猶鱖鱖生動也。」他們聽後果然食指大動，「頃之客有買鱗魚來者，果鮮活，色青，鰓微開合，遂烹魚，酌水晶菴石庭，菴瞰江。」

有貞(1407-1472)同友人遊蘇州雲巖時，一面旅遊登賞，一面則是山珍海味、飲酒喝茶，所謂：「列席而飲，用司馬公貞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筭。于時黃花方盛開，……而山珍海味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淪以茗，故雖酣而不醉，醉而不亂。」⁶³至晚明愈見顯著，如王臨亨遊廣東韶州附近的風景時，「命舟子移棹山陰，汲泉煮茗，飽噉嫩綠。」⁶⁴因而爲了帶酒煮茶，酒器與茶具亦不能少。如李日華的日記曾記載其欲往武林，但以雪盛不果行，「遂同細君、亨兒、丑孫攜酒罍茗床泛雪。」⁶⁵陳繼儒在〈游桃花記〉也說：「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暖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宋賓之、孟直夫，渡河梁踏至城以東，有桃花翦然。」⁶⁶他們所說的「榼」就是有蓋的酒器。

當然以士大夫的個性而言，少有自己背負攜帶這些器具，更何況所帶東西又如此之多，所以通常都有奴僕隨從。僕人中還包括了善歌的童子，如李日華的日記有多次記載他和友人出遊，攜有歌伎與歌童，「遊者鼓吹間作，絲肉雜陳，亦有以火花煙爆佐之者」，或是「令家童度新聲或演劇，以佐歡笑，超然自得」。⁶⁷鄒迪光在遊吳門諸山時雇了肩輿者十一，七以舁主人與客人，四以舁童子，因爲「諸童善歌，不欲以筋力敗咽喉，故於諸酒肴二擔，衾被三擔，從者四五人，循松蘿而進。」⁶⁸這些歌童的主要任務就是爲娛樂主人。又如袁宏道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與袁中道、江盈科(1553-1605)一行人同登上方山看月，「藏鉤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勝始歸。⁶⁹

⁶³ 〔明〕徐有貞，〈雲巖雅集志〉，收入〔明〕林世遠纂修，正德《姑蘇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冊 26-27（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正德元年嘉靖續修本影印，1988），卷 8，〈山上〉，頁 11。

⁶⁴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 4，〈志遊覽·紀行〉，頁 98。

⁶⁵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 7，頁 514。

⁶⁶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卷 9，〈游桃花記〉，頁 9a-b。又如李流芳在〈遊虎山橋小記〉說道至虎山之夜，「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遼闊，風露號然，真異境也。」見〔明〕李流芳，〈檀園集〉，卷 8，頁 7a。

⁶⁷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 2，頁 122；卷 6，頁 365。

⁶⁸ 〔明〕鄒迪光，〈鬱儀樓集〉，卷 36，〈遊吳門諸山記〉，頁 3a。

⁶⁹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 4，〈上方〉，頁 159-161。

此外士大夫旅遊時還會帶幾位廚師，如王思任在〈游敬亭山記〉就說：「廚人尾我，以一觴勞之留雲閣上。」⁷⁰他在遊覽「台蕩之勝」時，也是「敕一書記、一童子、一庖、一管辦，二粗力人行矣。」⁷¹帶廚師的目的也是為滿足主人的口腹之慾。

在明人的遊記中常見帶妓女或戲子隨伴，最有名的莫過於譚元春的〈再游烏龍潭記〉一文中對「姬」⁷²的描述，其云：

下雨霏霏濕幔，猶無上岸之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濕透衣表。風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無所惜。客乃移席新軒，坐未定，雨飛自林端，盤旋不去，聲落水上，不盡入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處。……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為潭所有，亦或即為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曰不盡然，不亦異乎？⁷³

此篇記中花了相當多的篇幅敘述隨行的妓女遇雨時的窘相，對作者而言似乎是旅遊中的另一大樂事。由此可見，攜妓的這種行為在當時士大夫的社交圈中，成了一種風流的韻事。⁷⁴李日華的日記中也有多次提及他旅遊時與受邀的遊樂場合，帶有歌妓與「姬」作表演娛樂遊客。如程姓徽商邀請他坐酒舫遊湖時，「呼廣陵摘阮伎二人，絲肉競發，頗有涼州風調。酒酣月出，登煙雨樓清嘯。二伎更爲吳歛新聲，殊柔曼攪人也。」⁷⁵

⁷⁰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游敬亭山記〉，頁 560。

⁷¹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紀遊〉，頁 645。

⁷² 明代江南地區稱婦女為「姬」（據錢希言，《戲瑕》，卷 1，〈稱姬〉，頁 12a-13b），但是在遊記中陪客人旅遊的「姬」恐非一般民家婦女，而應該是妓女或優人。

⁷³ 〔明〕譚元春，〈再游烏龍潭記〉，收入《譚元春集》，卷 20，《鵝灣集一》，〈記〉，頁 558。

⁷⁴ 如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就記載文徵明的一則趣事：「錢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按：文徵明的字號）泛石湖，雇遊山船以行，喚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開，呼此妓出見，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無計。」見〔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 28，頁 158。此故事又見於〔清〕唐仲冕編的《六如居士外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冊 262（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據昭代叢書排印，1989），頁 6b-7a，但是主角則是唐寅戲弄文徵明。

⁷⁵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 4，頁 247。又萬曆四十三年（1615）五月二十九日記有友人程掾具湖舫迎李日華等同禮部官員賀立庵泛舟旅遊，並呼善阮者楊姬陪酒，李日華云三年前曾認識楊姬，「今高髻綽約，光艷異常」，另又挾一小姬同遊。同前書，卷 7，頁 464。

（二）晚明的大眾旅遊

晚明以後不只是士大夫圈中盛行旅遊，在大眾文化中也蔓延一股旅遊的風氣，這可以從幾方面看到。首先是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城市附近的風景區也成爲一般大眾聚集旅遊的勝地。此外，除了傳統的歲時節慶之外，至明中葉以後還出現許多新的廟會節慶，這些民間信仰的廟會活動同時也帶動了旅遊風潮。還有表面上是具有宗教性質的進香活動，至晚明也愈發興盛，背後其實也是一種娛樂性的旅遊活動。

1. 城市旅遊

晚明以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城市如北京、蘇州、杭州、南京等地附近的名勝，都出現了「都人士女」聚遊與「舉國若狂」的景象。北京的例子，如袁中道在〈西山十記〉中描寫北京西直門外之西湖，「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爲勝處矣。」⁷⁶袁宏道的〈游高粱橋記〉也記北京西直門外的高粱橋，「京師最勝地也」；「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⁷⁷袁中道描寫北京的香山，「至於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⁷⁸

杭州自宋室南渡之後，西湖就已成旅遊勝地，至明代不衰。虞淳熙描繪杭州西湖與臨近慧日峰之間的美景時，也提到遊客眾多之景象：「升頂則日輪旭生，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舟如鳧，錦塘蘇堤，游人如蟻，簫鼓隱隱，聲如蝸蟬，而瓦如鱗、山如髻，則城中浙外之景也。」⁷⁹張瀚的《松窗夢語》也談到西湖旅遊之勝況：

杭俗春秋展墓，以兩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勝，故清明、霜降二候，

⁷⁶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卷12，〈西山十記〉，頁535。

⁷⁷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17，〈游高粱橋記〉，頁628。

⁷⁸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卷12，〈西山十記·記三〉，頁537。

⁷⁹ 〔明〕虞淳熙，〈慧日峰記〉，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214。

必拜奠墓下。此亦《禮》云：「雨露既濡，履之怵惕，霜露既降，履之悽愴」遺意也。然暮春桃柳芳菲，蘇隄六橋之間，一望如錦，深秋芙蓉夾岸，湖光掩映，秀麗爭妍。且二時和煦清肅，獨可人意。闔城士女，盡出西郊，逐隊尋芳，縱葦蕩槳，歌聲滿道，簫鼓聲聞。遊人笑傲於春風秋月中，樂而忘返，四顧青山，徘徊煙水，真如移入畫圖，信極樂世界也。⁸⁰

王叔承也形容西湖道：「湖中盡植紅蓮，異時若春夏晚秋，則錦雲萬頃，湖船、遊敖、畫艦或舴艋，輕橈如葉；士女好遊，多為青樓冶妝，遊無休時，綺繪與花柳相豔也。」⁸¹

南京的例子，如王士性在《廣志釋》書中所記載的秦淮河一帶，「夏水初闊，蘇、常遊山船百十隻，至中流，簫鼓士女闐駢，閣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觀為景。」⁸²另一個著名的景點是雨花台，正德《江寧縣志》云：「二月攜酒遊山，城南雨花台最盛，謂之踏青，每日遊人晚歸如蟻，迄三月終無間日。」⁸³

至於蘇州的大眾旅遊景點與旅遊活動更多，如正德《姑蘇志》所云：「二月始和，樓船載管簫遊山，其虎丘、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最盛，山下竹輿輕窄，上下如飛。」⁸⁴天平山在支硎山南五里，「並為遊者所走集，雖素玩麗矚不同，皆為山林生色。」⁸⁵除了山色以外，蘇州附近的荷花蕩與石湖亦是重要的觀光旅遊景點，如袁宏道在其著名的遊記〈荷花蕩〉一文中，形容葑門外的荷花蕩於每年六月二十四日時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雇覓一空。」而且「舟中麗人，皆時妝淡服，摩肩簇烏，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帷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

⁸⁰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7，〈時序紀〉，頁136-137。

⁸¹ [明]王叔承，〈武林富春遊記〉，《古今遊記叢鈔》，冊4，頁63。

⁸² [明]王士性，《廣志釋》，卷2，〈兩都〉，頁24。

⁸³ [明]王誥、劉雨纂修，正德《江寧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冊2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正德刻本影印，1988），卷2，〈風俗〉，頁18a。

⁸⁴ [明]林世遠纂修，正德《姑蘇志》，卷13，〈風俗〉，頁3b。

⁸⁵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卷3，〈山〉，頁42。

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輓濤趨。」所以在文末他指出這是「蘇人遊冶」極盛的代表。⁸⁶至於石湖則在蘇州西部，三峰環遶，唐代已在此建梵宇楞伽寺，自古即有大眾的宴遊活動，至明代亦是如此。朱逢吉的〈遊石湖記〉就說：「自前代時，城內外暨村落百餘里間，男女稚耄，當春夏月，遠近各相率舟行，載酒肴，雜樂戲具。徒行，乘馬驢竹兜，競以壺榼食器自隨，或登以樂神日，肩摩跡接，畢則宴遊，以樂太平，逮今如之。」⁸⁷

2. 廟會節慶

晚明在傳統的節日之外，又出現許多新興的廟會節慶。相較於過去，明末清初的廟會節慶顯示出種類的多樣化、活動的頻繁化與空間的普及化等特點。⁸⁸有的地區這類廟會節慶更進一步地發展到以城鎮為中心，而將城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巡會」節慶，如《吳社編》中描寫蘇州城內祭祀五通神的「五方賢聖會」時，提到除了在城中有「會首」主其事外，還記載城廂週邊鄉村參與者，稱為「助會」者：

荒隅小市，城陰井落之間，不能為會，或偏門曲局，一部半伍，山裝海飾，各殫其智，以俟大會成並入會之者，曰：「助會」。⁸⁹

另外還有所謂「解錢糧」習俗，即市鎮附近信仰村廟的鄉民，在市鎮神廟（可能是鎮城隍廟、東嶽行宮或總管廟等）的誕辰節慶時，要上納銅錢或紙幣，還要抬村廟神像到市鎮參拜。無論是「助會」或「解錢糧」，都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後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加深了小農經濟與市場的關係，使農民日常

⁸⁶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4，〈荷花蕩〉，頁170。

⁸⁷ [明]朱逢吉，〈遊石湖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冊4，卷15，〈江蘇省〉，頁36-37。

⁸⁸ 有關明中葉以後新興節慶的出現，江南的例子參見拙作，〈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4（2000年12月），頁152-157；北京的例子，見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226-239。

⁸⁹ [明]王穉登，《吳社編》，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4冊6（台北：新興書局，1970），頁4042。清代蘇州城隍廟會也有「助會」者，也是鄉村市鎮不能為會者，併入大會。參見[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卷3，〈三月〉，「山塘清明節會」條，頁99。

生活的圈子超越了「村」的範圍，而是以特定的市鎮或縣城為中心。⁹⁰

這種大規模的巡會活動是以城市與市鎮為中心，將週邊鄉村結合在一起的廟會，其實也是提供了鄉村大眾在農閒的時節，可以到城市內從事短程距離旅遊的機會。就以明末蘇州著名的城隍神的「三巡會」為例，據《識小錄》云：「始惟府城隍出，數年來兩縣隍亦出，未幾而各鄉土地盡出。山塘一帶觀者如雲，鼓樂幡幢，盈塞道路，婦女至質屋而觀。……乙酉(1645)亂後，人更多，山塘至虎丘，無一寸隙地，識者以為不祥。」⁹¹康熙《蘇州府志》在提及城隍巡會的起源時也說道：「明末好事者，並以十鄉土地陪祭，香華儀從之盛，絡繹山塘，游人雜沓。」⁹²由此可見，這類巡會節慶已成了城鄉人民的另一種旅遊活動。

3. 宗教進香

大眾的旅遊活動中有一類是行程較遠，且具宗教性質的進香活動，如蘇州在二月十九日，以觀音誕辰往支硎山進香。六月十九日為觀音成道之日，信徒與民眾亦至支硎山進香。⁹³袁宏道的〈湖上雜敘〉也記載他喜好旅遊，「過西湖凡三次」；在湖上住昭慶寺五天，法相、天竺兩寺各一夜。但是他對天竺山信徒進香的活動印象深刻：「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煙不可近。」⁹⁴華北地區進香活動也很盛，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就是碧霞元君的信仰，如張大復(1554-1630)在〈濟上看月記〉一文中，描寫他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經過河北涿州時所見大眾往碧霞宮進香之情景：

⁹⁰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國都市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頁226-229；濱島敦俊，〈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1343-1351。

⁹¹ 〔清〕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40冊3（台北：新興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佛蘭草堂手鈔本影印，1990），卷4，〈吳中巫風〉，頁565-566。

⁹² 〔清〕沈世奕撰，康熙《蘇州府志》（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二十二年序刊本景照），卷21，〈風俗〉，頁12b-13a。

⁹³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卷10，〈風俗〉，頁3b。

⁹⁴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10，〈湖上雜敘〉，頁438。

過涿州之日……，時聞鐘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客也。」往覘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兒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壘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爐，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媪，乞兒歌郎，啞女攀子，獻天堂稀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蝎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間。麥風毛雨，寒沁肌骨，遂舍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為我也。⁹⁵

在這些進香活動的背後其實也是娛樂性的旅遊。費元祿在《鼈采館清課》一書中，每每談及這類宗教活動時，也視之為民眾的娛樂活動。如他提到孟秋港西之役有士女禮朱元君神的活動：

孟秋港西之役，士女禮朱元君，簫鼓不絕者千艘，各為婆婆按節以樂神，舟中之指可掬也。余發龍門過緒亭，日夕而入港，則港已泊萬人矣。笑語喧騰，樂聲間作，山勢迴合，墟里藏陡峭間，山岳為應；漏半燎火四壁，從山上望白雲中，小星萬點，纍纍引貫而入。諸士女畢會，物色駢湧，平明稍散去。此何異天門禮華山玉女耶？至所稱瘞玉埋璧之盛，故遜之矣。⁹⁶

所謂的「笑語喧騰，樂聲間作」；「諸士女畢會，物色駢湧，平明稍散去。」這些形容都說明這類活動中的娛樂性濃厚，對照起來宗教的活動似乎變成次要的，所以他會說：「至所稱瘞玉埋璧之盛，故遜之矣。」又如他談到佛家七月望日的盂蘭齋會，宗教活動有「長者布金，士女施金錢以千計，冀徼福田利益。」但是據他的觀察這是另一種娛樂，「余從九陽江望河燈，下龍門關數里不絕，無慮萬點，若星漢錯落，珠連璧合，波文蕩漾，足當水嬉」，⁹⁷因而我們很難將這類進香活動時的「香客」與「遊客」做明顯地區分。⁹⁸

⁹⁵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5），卷 4，《濟上看月記》，頁 26a-27a。

⁹⁶ 〔明〕費元祿，《鼈采館清課》，卷上，頁 9b。

⁹⁷ 〔明〕費元祿，《鼈采館清課》，卷下，頁 7b。

⁹⁸ 關於大眾進香的旅遊活動之研究，參見 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一書中諸文。

(三) 普及性、舒適性與娛樂性

晚明旅遊活動呈現的特點之一就是普及性。在晚明大眾旅遊風氣盛行之下，參與的人漸漸普及下階層，進香的活動也顯示出庶民大眾已經可以從事遠距離的旅遊活動。有趣的是，大眾旅遊在地點上有許多是與傳統文人雅士的旅遊地重疊，蘇州的虎丘山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黃省曾在《吳風錄》中云：「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虎丘尤甚，雖風雨無寂寥之日。」⁹⁹但是虎丘也是蘇州大眾旅遊的重要景點，如李流芳在〈遊虎山橋小記〉一文中就描寫道：「是夜，至虎山。……居人亦有來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¹⁰⁰沈周有〈月夜千人石獨步〉詩云：「城中士與女，數到不知幾。列酒即為席，歌舞日喧市。今我作夜遊，千載當隗始。」¹⁰¹

還有一些節日在明代中期以前，原本是與民間信仰無關的士大夫旅遊時節，卻到後來發展成大眾旅遊的廟會節慶。如在蘇州府崑山縣的九月九日，俗稱重陽節，原來在明代時的記載只有士人的登遊活動，如萬曆《崑山縣志》云：「重九，詩人高士，亦有以菊花茱萸飲酒登高者。」之後的發展則是又另外形成一種民間信仰的廟會節慶活動，如道光《崑山新陽兩縣志》就記：「九日重陽節，集馬鞍山為登高會，亦有舁神像登高者，是日喜晴。」¹⁰²以上的這兩現象說明了大眾化的城市旅遊與廟會節慶已衝擊到原來士大夫的旅遊活動。

晚明旅遊活動的第二個特點是舒適性與娛樂性。從以上對晚明士大夫旅遊的敘述與分析，可以看到晚明士大夫的旅遊風氣很盛，在地點選擇上是以中、短距離為主，而不是遠距離的冒險式旅遊。他們都很重視乘坐交通工具

⁹⁹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6冊5（台北：新興書局，1989），頁1a。

¹⁰⁰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遊虎山橋小記〉，頁6b。

¹⁰¹ [明]林世遠纂修，正德《姑蘇志》，卷8，〈山上〉，頁2b。

¹⁰² [明]周世昌撰，萬曆《崑山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433（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四年刊本影印，1983），卷2，〈風俗〉，頁195-196；[清]張鴻、來汝緣修，王學浩等纂，道光《崑山新陽兩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冊1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道光六年刻本影印，1991），卷1，〈風俗·占候〉，頁26b-27a。

的舒適性。旅遊時的器具也很齊全，且不全都是必需品，而多有茶、酒等奢侈消費品。從他們旅遊時攜帶隨從與歌妓等行徑來看，旅遊已成士大夫們重要的娛樂活動。

同樣地，大眾旅遊活動也是以娛樂性為目標。前述大眾旅遊中有關城市旅遊的描述，動輒用「游人如蟻」、「士女雲集」、「一國若狂」與「以樂太平」來形容當時的旅遊情景。再者，對大眾來說，廟會節慶也是他們重要的歡娛場合，就像康熙《松江府志》的作者憶及崇禎末年府城隍廟會節慶的印象：「忽于二門起樓，北向演劇賽神，小民聚觀，南向而坐，殿庭皆滿，歡呶嬉笑。」¹⁰³進香活動的背後其實也是以娛樂為目的，就像費元祿形容朱元君神的進香活動時，所謂「笑語喧騰，樂聲間作」的景況。

四、旅遊消費觀的爭論

晚明的旅遊風氣也成為士大夫在討論風俗論的重要焦點，對一些士大夫而言，尤其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大眾旅遊，常被認為是奢侈的現象而備受批評。如黃省曾在《吳風錄》中就指出，蘇州過去盛行遊虎丘、西山踏青、盛夏觀荷花蕩的旅遊活動，直到兩位地方官執行禁令之後才略有變化，「先郡守王公廷毀舟後，蔡公國熙禁山遊，稍正風俗」，可見他認為這類旅遊活動並非善良之俗。¹⁰⁴有些官員的看法是從傳統經濟觀念中的「本末論」出發，如張瀚在《松窗夢語》中就說道：

因思吾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為固然。當官者不聞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者。賈子生今，不知當何如太息也！夫為人上者，苟有益於下，雖損上猶為之，如有損於下，

¹⁰³ 〔清〕郭廷弼修，周建鼎等纂，康熙《松江府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刊本），卷 54，〈遺事下〉，頁 21b。

¹⁰⁴ 〔明〕張德夫修，皇甫汈等纂，隆慶《長洲縣志》，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23（上海：上海書店據隆慶五年刻本影印，1990），卷 1，〈風俗〉，頁 6b 引〔明〕黃省曾，《吳風錄》。

雖益上不為。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安得躬行節儉，嚴禁淫巧，祛侈靡之習，還樸茂之風，以撫循振肅於吳、越間，挽回叔季末業之趨，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¹⁰⁵

他認為燈會這種旅遊娛樂活動是「末」業，江南城市內如此過於奢華熱鬧的舉行反而會影響農業生產的「本」業，所以地方官應該加以禁止。如果地方官不加以禁止，「縱宴遊之樂」是有損國家與民生，即所謂「上下俱損矣！」還有官員是從財政稅收的角度來批評的，如曾任內閣首輔的申時行(1535-1614)在〈吳山行〉一文中云：

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勝事俗相誇。闔閭城中十萬戶，爭門出郭紛如麻。拍手齊歌太平曲，滿頭爭插茱萸花。橫塘迤邐通茶磨，石湖蕩漾繞楞伽。蘭橈桂楫千艘集，綺席瑤尊百味賒。……此日遨遊真放浪，此時身世總繁華。道旁有叟長太息：「若狂舉國空豪奢，比歲倉箱多匱乏；縣官賦斂轉增加，閭閻凋瘵（按：乃肺癆病也。）誰能恤，杼軸空虛更可嗟。」¹⁰⁶

上文曾談到蘇州在九月流行登高之遊，無論士庶都會踴躍參與。可是申時行在文中藉老叟之語，批評這種旅遊活動太過奢侈浪費，使得官、民蓄積不多，一旦地方政府增加稅賦，必會導致人們無力負擔，國家基礎也因而動搖。

但是也有士大夫並不以為然，他們並不認為這樣的旅遊活動的興盛是不好的，如江盈科的〈游虎丘記〉，記其與任實驂同遊虎丘時見到「畫船鱗次，管弦如沸，都人士女，靚妝麗服，各持酒餚，彈棋博陸」，任君感觸良多地對江盈科說道：

樂哉！維昔五六年間，天降靈眚（按：災難），首被于吳，比歲不登，稊米若珠。白晝大都持糶過市，健兒從之，紆臂奪食；丁男鬻人，才

¹⁰⁵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4，〈百工紀二〉，頁79-80。

¹⁰⁶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卷10，〈風俗〉，頁4b-5a。

得斗粟，老羸稚弱，橫死相屬。嗟夫！今之畫船簫鼓，首尾銜接者，固昔之臥殍枕藉，僵屍蔽岸之所也；今之黍苗芄芄，嫩綠被畝，三農舞蹈而慶豐稔者，固昔之孤狼飽嘯，白骨交加之地也。昔何以苦，今何以樂？……維予與子追昔日之苦，幸今日之樂。¹⁰⁷

他從旅遊風氣的由漸而盛來比較昔日之苦與今日之樂，可見在他的觀念中旅遊風氣的興盛是一種太平景象。又如田汝成在其著的《西湖遊覽志》一書中的〈序〉，談到他寫該部旅遊書時被批評為助長奢侈之風：「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欲宣奢，非以長化也。」但是他則不以為然，認為杭州西湖旅遊活動之盛本是事實，「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只益浮偽爾，史家不為也」，¹⁰⁸他並不認為旅遊活動有何不當。

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刺激了新型消費觀念的產生，在知識階層中出現的一些「崇奢」言論，也都以江南的旅遊活動作為論述的中心。¹⁰⁹最為著名的論點就是陸楫(1515-1552)在《蒹葭堂稿》中主張「奢易為生」的文章，其中提到旅遊活動的正面作用：

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珍饈、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饜者，不知其幾！……彼以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工易事，羨補不足」者也。¹¹⁰

他認為蘇杭旅遊活動表面上看似奢侈，但是這樣的奢侈消費卻提供眾多的就

¹⁰⁷ [明]江盈科，〈游虎丘記〉，收入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卷7，〈記文〉，頁345。

¹⁰⁸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序〉，頁2。

¹⁰⁹ 史學界關於晚明奢侈靡論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參見林麗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論〉，《台灣師大歷史學報》，期19（1991年6月），頁215-234；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卷5期2（1994年6月），頁159-179；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頁28-34；林麗月，〈《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頁121-134。

¹¹⁰ [明]陸楫，《蒹葭堂稿》（嘉靖四十五年陸氏家刊本），卷6，頁3b-4a。

業機會。之後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論點，如萬曆年間王士性在《廣志繹》書中，對於杭州的「遊觀」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如下：

游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為游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¹¹¹

他認為「遊觀」這種被視為奢侈浪費的習尚，卻帶給當地人很多就業機會，所以根本不必強加禁止。又如葉權(1522-1578)在《賢博編》一書中，更是以杭州西湖為例，說明旅遊興盛對人民的生計是有益而無害：

杭州之奢侈，錢氏時已然，南宋更靡，有自來矣。城中人不事耕種，小民仰給經紀，一春之計全賴西湖。大家墳墓俱在兩山，四方賓旅渴想湖景，若禁其遊玩，則小民生意絕矣。且其風俗華麗，已入骨髓，雖無西湖，不能遽變。往遭兵饑，春來湖中寂寞，便非太平氣象。余少時則見其逾遊逾盛，小民逾安樂耳，何煩禁之？此宋儒荒年建塔之意，可與智者道，但戒壇則不開可也。¹¹²

在他的觀察中，杭州及其附近住民即倚靠觀光旅遊業為生，若一旦禁止反而使百姓生業無著。過去每遭兵燹時，西湖的旅遊業衰退，百姓生計即遭損，此萬萬非太平景象。所以他認為旅遊業愈盛、愈奢華才是好現象。

晚明興盛的旅遊消費算不算是過度的奢侈浪費，一度成為人們爭論的議題；然而也在此時有人由旅遊消費出發，重新檢討傳統奢侈的經濟觀念，衍申出奢易治生的說法，正視旅遊消費所具有的積極正面作用。

¹¹¹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頁69。

¹¹² 〔明〕葉權，《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9。

五、晚明旅遊「風尚」的形成和身分認同的問題

(一) 身分地位的競爭與炫耀式的消費

由上一節的分析與論述中明顯地看到晚明的旅遊活動相當普及，過去在明代中期以前能夠旅遊的人大多是知識階層的士大夫，如今旅遊已經不是士大夫們的專利，一般大眾也可以從事旅遊活動，甚至是遠距離的進香旅遊。由消費的角度來看旅遊活動，我們可以說晚明已進入所謂的「風尚體系」(fashion system)，亦即社會流動已非停滯，或是消費上也不再有許多限制以保障少數人的身分地位，而是下層社會愈來愈多人有能力模仿上層社會的消費行爲，而且消費物品的創新與品味更新的速度也愈來愈快。¹¹³

前述大眾旅遊的興盛中，商人在旅遊活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吳寬(1435-1504)在〈送章廷佐還金華序〉一文中，提到金華到南京一帶風景絕佳，旅遊者眾，而遊客的身分並不限於仕宦者，所謂：「非必供職役，服商賈而有事于茲者，皆可游也。」¹¹⁴又例如商人在旅遊的交通工具方面更是極盡奢華富麗之能事，特別是具有視覺效果的游船、畫舫之類。晚明商人的力量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而增強，也使商人階層不但經濟地位大升，其社會地位更非昔日可比，商人擁有畫舫已不足爲奇。最好的例子就是南京秦淮河上雲集的畫舫景觀，人們稱之爲「燈船」，且看鍾惺(1574-1624)的描述：

小舫可四五十隻，周以雕檻，覆以翠幙。每舫載二十許人，人習鼓吹，皆少年場中人也。懸羊角燈於兩傍，略如舫中人數，流蘇綴之。用繩聯舟，令其啣尾，有若一舫。火舉伎作，如燭龍焉。已散之，又如鳧雁縈跚波間，望之皆出於火，值得一賦耳。¹¹⁵

¹¹³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5.

¹¹⁴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明正德刊本影印出版，1967），卷39，〈送章廷佐還金華序〉，頁242。

¹¹⁵ 〔明〕鍾惺，〈秦淮燈船賦〉，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

畫舫裝飾之富麗已是令人驚歎，而集眾舫連成一氣的「燈船」景象，更可說是金陵之一大奇景也。所以鍾惺又形容道：「集眾舫而為水兮，乃秦淮之所觀。借萬炬以為舟兮，縱水嬉之更端。」當然這類畫舫與燈船的擁有者絕非全是士大夫階層，事實上大多數都是富商所有。秦淮河畔的這類景象，就如同《揚州畫舫錄》中對鹽商奢侈的描寫，都是商人或富人誇富的展示。

過去士大夫常去旅遊的景點以及慣用的遊具，也都漸漸為大眾旅遊所模仿與襲用，尤其是士大夫得面臨商人階層的競爭。例如乘畫舫旅遊就形成一種士商間的社會競爭，在江盈科與王穉登(1535-1612)的一封信中，就曾描繪他個人遊虎丘時所碰到的一次驚險事件：

甫投筆，見夕照在山，紫綠交映，命童子提胡床坐船頭，披夕爽。乃南來巨艦，與我舟爭道，不佞謹避之，躍入船窗不能得，兩舟橫沖如霆擊，我舟幾覆。不佞倏而墮水，水沒吾頂，去岸逾尋。¹¹⁶

這次巨艦爭道事件差點讓江盈科的游船翻覆，這艘巨艦很可能就是巨商的畫舫。

旅遊的花費可以說是一種休閒消費，其實所費並不低，尤其是像晚明士大夫帶著僕人隨從的旅遊，若無相當程度的財力是無法去旅遊的。然而，晚明喜好旅遊的士大夫不見得都有如此財力去消費，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中屬於中、下層的士人們，在經濟力方面已不如商人，在面臨商人的社會競爭與挑戰時，卻不能就因此而放棄，因而需要尋求贊助者的支持。陳繼儒曾稱讚徐弘祖(1587-1641)，說他「不謁貴，不借郵符，不覬地主金錢，清也！」¹¹⁷言外之意是當時的士大夫除了高官名宦以外，若是下層士人想要過足旅遊的癮，通常都會找貴人贊助，就如同歸莊(1613-1673)在〈五游西湖記〉中指出所謂「布衣游」即一般文士的旅遊消費有三類：一是「因人之遊」；二是「作

頁 278。

¹¹⁶ [明]江盈科，〈與王百穀〉，《江盈科集》，卷 13，〈尺牘〉，頁 590。

¹¹⁷ 陳繼儒，〈答徐霞客〉，收入[明]徐弘祖著，褚紹唐與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附編〉，頁 1183。

客之遊」；三是「獨往之遊」。前兩類都不需要自己花錢，因為作官的「貴人」在遨遊時必以文人騷客自隨為伴，文人騷客遂得不費資斧而登覽山川；而趁機拜訪同門或同年的官員，順便可作客旅遊，也不需花費。¹¹⁸隨官員旅遊時可以借用公家的夫役，就像謝肇淛在《五雜俎》一書中清楚地說：「遊山不藉仕宦，則廚傳輿僮之費無所出。」¹¹⁹從許多遊記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士人跟隨官員旅遊的例子，甚至還有人向官員詐取旅遊費用的事。¹²⁰

晚明士大夫之所以熱衷旅遊這種看似毫無實際用處的消費，實乃因旅遊是一種「炫耀式的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正好是身分地位的表徵。所以旅遊不只是一種休閒活動而已，還是士大夫用來與別人區隔的象徵。尤其是晚明的下層士人面對強大商人階層的社會競爭，故而想藉旅遊活動來凸顯自己的身分地位時，又因財力的有限，除了尋求官員的支助以外，最後可能還是得靠富戶與商人的贊助。謝肇淛就說與仕宦遊山仍有許多不便與煞風景的缺點，所以他又說：「故遊山者須藉同調地主，或要丘壑高僧」，「富厚好是之主，時借其力。」¹²¹再從前述李日華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商人邀請與贊助旅遊的情形。雖然在士大夫的遊記中很少提到商人贊助之事，但是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可以推測當時「士商相混」的現象中，出現這類行為應是頗為平常的事實。所以晚明才會流行說士人、文人見到商人如「蠅之集羶也」。¹²²

在以下的幾小節中，我們可以看到晚明的許多旅遊論述多是士人階層所創發，特別是以文學著名的文士；在這些旅遊論述中反映了他們極力想塑造新的旅遊品味，以區分其與大眾旅遊不同的心態。

¹¹⁸ [明]歸莊，《歸莊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6，〈五游西湖記〉，頁374。

¹¹⁹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4，〈地部二〉，頁87。

¹²⁰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傳說唐寅(1470-1523)和祝允明兩人浪遊揚州時，極聲伎之樂後卻費用乏絕，乃偽裝成蘇州元妙觀道士向鹽運使募捐，得賞後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事見〔清〕唐仲冕編，《六如居士外集》，頁3a-b。

¹²¹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4，〈地部二〉，頁87。

¹²² 此類嘲諷見〔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16冊4（台北：新興書局，1977），卷上，〈蠅聚一羶〉，頁50-51；〔明〕文元發，《學圃齋隨筆》（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頁578。

(二) 雅俗之辨

晚明的遊記顯示有不少士大夫，特別多是中、下層的士人們會把旅遊和身分連繫起來，認為他們的旅遊文化就應該是與大眾不同。他們這樣的表現尤其發生在江南城市附近遊人最盛的著名風景點，因為這些景點也是大眾旅遊最盛的地方。他們選擇在旅遊時刻意地錯開大眾旅遊的時間，如李流芳就說蘇州旅遊虎丘「獨不宜於遊人雜沓之時」，所以最佳的旅遊時間是在半夜，他在〈遊虎丘小記〉就說：

虎丘中秋遊者尤勝。仕女傾城而往，笙歌笑語，填山沸林，終夜不絕。遂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予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風亭月榭間，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復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今年春中，與無際舍姪偕訪仲和於此。夜半月出無人，相與趺作石台，不復飲酒，亦不復談，以靜意對之，覺悠然欲與清景俱往也。……友人徐聲遠詩云：「獨有歲寒好，偏宜夜半遊。」真知言哉！¹²³

在文中他痛恨大眾旅遊時眾聲嘈雜，將美景名勝變成庸俗之地，即「使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所以他要在「夜半月出無人」時來遊，才能達到「山空人靜，獨往會心」的境界。

另一個著名的旅遊勝地杭州西湖，同樣因為大眾旅遊太興盛了，士大夫就得刻意找遊人稀少的時節來旅遊。如張京元說：「蘇堤度六橋，堤兩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游人闌塞，不若此時之為清勝。」¹²⁴張京元選擇的是人少的季節，也有人選擇的是一天中早晚的時辰，如袁宏道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辭去吳縣知縣後漫遊吳越其間，第一次遊覽杭州西湖時就說：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

¹²³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8，〈遊虎丘小記〉，頁6a-b。

¹²⁴ [明]張京元，〈蘇堤〉，見〈湖上小記〉，收入〈古今遊記叢鈔〉，冊4，卷18，〈浙江省〉，頁1。

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¹²⁵

他把一般時段遊湖的杭人看作是「俗士」，把懂得選時間在「朝日始出」來遊玩的「山僧遊客」的地位抬高。同樣類似的例子，如張岱在〈西湖七月半〉文中介紹了晚明時杭州人在七月半遊西湖的盛況，除了生動地描繪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種種情態之外，文末談及他自己的旅遊方式則云：「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¹²⁶由此可見，士大夫們故意要選擇時間，或發展自己特意獨行的旅遊時間，如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提到他曾與友人同遊湖，當時氣溫很冷，「時河冰片段蝕舟，夕陽射之如碎玉。岸柳千樹，寒條刺天，游者絕跡。」可是他卻自鳴得意，「余以為清虛洞朗，無逾此時者，勝春江夜月多矣。」¹²⁷

除此之外，為了與一般大眾作區分，還有人會刻意地選擇一般大眾不常去的地方作為其旅遊之地。要件之一就是地點不能太近城市，因為靠近城市就會引來太多的遊客，而把他們想要獨享的「雅」趣污染了。就像王世貞論旅遊景點時特別推崇蘇州城郊的石湖，其原因是：「以吾吳之勝，地非不足，而其邇者，迫於市囂之屬耳，而市人子之接跡；其勝而遠者，車馬怠而供張易竭；能離而又能兼之者，獨有茲湖而已。」¹²⁸李流芳就說蘇州附近虎丘的缺點：「蓋不幸與城市密邇，游者皆以附臙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他於中秋夜偕游虎丘時大歎：「穢雜不可近，掩鼻而去。」¹²⁹再以南京而言，譚元春在〈初游烏龍潭記〉一文中，提到他特別喜歡城內的烏龍潭：

¹²⁵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10，〈西湖二〉，頁423-424。

¹²⁶ [明]張岱，《陶庵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7，〈西湖七月半〉，頁63。

¹²⁷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5，頁352。

¹²⁸ [明]王世貞，〈越西莊圖記〉，收入崇禎《吳縣志》，卷23，〈園林〉，頁31b。

¹²⁹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11，〈《江南臥游冊》題辭之一〉，頁12b。

白門（按：即南京）游多在水。磯之可游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游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游者，曰「秦淮」，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游者曰「烏龍」，在城內，舉舁（按：借作「輿」，此處指轎子或肩輿）即造，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¹³⁰

南京城內外旅遊勝地正合乎士大夫品味中所注重的「三患免焉」的條件，即距離不遠、美景時間較長、遊人不多等條件。因為一般大眾都會去南京城內與近郊的旅遊勝地，惟獨該處不但是在城內舉輿即造，而且「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所以是個絕佳的地點。或是在一般大眾旅遊的地區找一個群眾不太會聚集的地方，如李日華在其日記中提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中元節時，他與友人及其子夜遊杭州西湖蘇堤云：「俗重中元盂蘭佛事，至是士女傾城，夜泛湖中，大小船無不受雇者，迨明乃止。然亦只東北半壁如沸，若湖南，寂寂一片月光，照踏歌數輩而已。」¹³¹這次的旅遊經驗很好，所以他還說：「因相約暇時訪之。」

有時士大夫在旅遊時還會故作異態，以吸引眾人之眼光。如袁宏道在旅遊時喜歡獨樹一幟，故意作出一些特異的行徑。他在北京游高梁橋時所寫的遊記中就描寫他和友人故作風雅，「趺坐古根上，茗飲以為酒，浪紋樹影以為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為戲具。」而對來往遊客的眼光則嗤之以鼻地說：「堤上游人，見人枯坐樹下若痴禪者，皆相視以為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樂何有也？」¹³²透過這種作態(gesture)，正可以展示士大夫與眾不同的一種風格或品味。

（三）「遊道」——品味塑造的理論化

晚明有些士人極力想發展一套特別的旅遊理論，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遊

¹³⁰ [明]譚元春，〈初游烏龍潭記〉，收入《譚元春集》，卷20，《鶴灣集一》，〈記〉，頁557。

¹³¹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7，頁471。

¹³²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17，〈游高梁橋記〉，頁682。

道」。細看這些將旅遊理論化或形而上的說法，其實都有一些特別的目的。如果從消費角度來看，與其說是將旅遊行為理論化，不如說是一種消費品味的塑造，為的就是與眾不同。

晚明的旅遊風氣帶動下造成大量的遊記文體出版，沈愷就曾批評此現象：「今夫好遊者遇有名勝，輒談詞摘藻，非不人人能，然以餘所睹記，率多留連光景，凌虛駕空而侈言無當。」¹³³又如錢謙益在〈越東游草引〉一文中也曾提及當時流行寫遊記的風氣：「余嘗聞吳中名士語曰：至某地某山，不可少一游。游某山，不可少一記。」甚至到了「今杭城刻名山記累積充几案」的程度。¹³⁴由此可知，撰寫遊記是士大夫重要的文化資本，一方面是用來塑造品味，另一方面是用來和一般遊人區隔的重要指標，所以鄒迪光在〈台鷹草自序〉一文中強調：「夫遊亦難言矣，必濟勝有具，尤必紀勝有筆。濟勝無具，則陟巍臨深，祇涉影響；紀勝無筆，則搜奇剔異，亦落夢境。」¹³⁵

在晚明的一些遊記中可以看到特別是某些自視高雅的士人，常以遊道為名，將當時的旅遊風氣批評一番，認為高雅的「遊道」已沉淪了，如胡應麟(1551-1602)就云：「蓋詩與遊道迄于今胥病矣！」¹³⁶而遊道的沉淪是被一些人庸俗化的結果；最常被嘲笑的對象就是商人及清客，後者可能也都是些下層的生員之流。如陳繼儒就歎道：「游道之賤也，寧獨今日哉！」其云：

昔游有二品，而今加三焉。賈之裝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操其邊幅之技，左挈賈而右挈客，陽吹其舌于風騷，而陰實其裝于稠糞。施于今而游道辱矣！……瞌睡半生，毋與客、賈肩隨而趨，為青蓮老子（按：指李白）所笑。¹³⁷

¹³³ [明]沈愷，《環溪集》，卷3，〈奇遊漫記序〉，頁12a。

¹³⁴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32，〈越東游草引〉，頁927-928。

¹³⁵ [明]鄒迪光，《始青閣稿》，收入《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03（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天啓刻本影印，2000），卷11，〈台鷹草自序〉，頁21b。

¹³⁶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卷82，〈王生四遊草序〉，頁5b。

¹³⁷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卷6，〈記游稿序〉，頁2a。

這些人寫遊記時批評別人的用意，其實就是為烘托出自己的旅遊品味出眾。陳繼儒在另一篇〈閩遊草序〉中透過其友周公美的話，又再一次地來批評商人與清客的旅遊行為：

我見入閩者，動以為題。然非游以買，則游以舌，獨余則否，不借郵符，不乞驕騎，不丈地主酒錢，此游之清者也。手無鐻，趾無坎，腰膝無絙（按：捆著的絲繩）帛，賈勇先驅，置兩足於空外，置七尺于死法外，此游之任者也。猿不易枝，鳥不變聲，樵牧無故識，伴侶無異同，此游之和者。游據此三德，而時以詩為政。¹³⁸

最後他提出自己遊道的「三德」，也就是不找人贊助、不帶過多遊具、不找導遊。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王思任的〈紀遊〉一文，不過，他的批評比陳繼儒更廣及各種身分的人，如官宦、士人、富人、窮人；各類年齡層，如老人、青年人；以及各種形式的旅遊，如孤遊、托遊、便遊等等，都指稱他們有缺點：

予嘗謂官游不韻，士游不服，富游不都，窮游不澤，老游不前，稚游不解，哄游不思，孤游不語，托游不榮，便游不敬，忙游不謙，套游不情，挂游不樂，勢游不甘，買游不遠，賒游不償，燥游不別，趁游不我，幫游不目，苦游不繼，膚游不賞，限游不道，浪游不律。而予之所謂游，則酌衷于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游道如海，庶幾乎蠹測之矣。¹³⁹

批評完別人後，文末要強調的是他自己的「遊道」最高深、最好，所謂「酌衷于數者之間，避所忌而趨所吉，釋其回而增其美。」他強調唯獨自己瞭解旅遊之道理，其實說穿了也就是說他的品味出眾，與人不同。在明人所編「翠娛閣」評選小品集中對此文的評論是：「游識趣事，人嘗俗之，故宜有此指

¹³⁸ [明]陳繼儒，〈閩游草序〉，頁 260。

¹³⁹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下）》，〈紀遊〉，頁 646-647。

示。游境，俗人得之自俗，雅人得之自雅。」這段評論其實更清楚地呈現了像王思任所謂的遊道，就是要區分他自己形塑的「雅」與一般人的「俗」不同。

由「遊道」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某些士人所要區分的對象，已不只是一般能從事大眾旅遊的庶民而已，從富有的商人、作清客的俗士，甚至是官宦的旅遊行為都成了他們區辨與競爭的對象。

（四）「遊具」的精緻化——品味塑造的具體化

隨著旅遊風氣的興盛，晚明有一些著名的文士發展出了一套「遊具」的論點。當時的著作中可以高濂（生卒年不詳，活動約在明嘉靖、萬曆間）的《遵生八箋》、屠隆(1542-1605)的《遊具雅編》和文震亨(1585-1645)的《長物志》這三部作為代表，三部書中有系統地說明了遊具的種類與功能。大致上遊具可分為五大類：衣履冠飾、裝備配件、飲食器皿、文房器具、交通工具等（參見附表）。從這三本書內容記載與論述的演變來看，有許多部份非常相似，可見這三本書有相當部份是先後傳抄的。此外，被視為遊具的範圍越來越小，而且初期的論述多強調實用性，或是以「精」、「佳」或「不佳」、「不宜」來區分好壞，但是後來很明顯地用「雅」與「俗」來區分好壞。由此可知晚明有些文士正在利用遊具，將之精緻化，以塑造自己的品味，並且具體地展示出來。下面就舉出幾個代表性的「遊具」為例作說明。

高濂與屠隆的書中都寫到他們最重視的四件東西是：提盒、提爐、備具匣與酒尊。「提盒」的作用類似現代的便當盒，但是容量更大。內有多個夾層，夾層中再分成四格與二格；可裝六個酒杯、一個酒壺、六對筷子、二個勸杯；其它分格的地方，四格分的空間每格裝六小碟下酒的果餠，分二格的空間每格放四大碟鮭菜。據作者稱此提盒的容量，「足以供六賓之需」（參見附圖五、八）。「提爐」內則分為三層，最下一層中有銅造的水火爐嵌入底層；其上的夾板有二孔，一邊是放茶壺煮茶用，一邊放像桶子的鍋，可燉湯與溫酒用。最上層則放備用的炭火（參見附圖六）。「備具匣」是上淺下

深的箱子，內有小梳具匣、茶盞、骰盆、香爐、香盒、茶盒等，還可以裝文房四寶；再加上圖書小匣、股牌匣、香炭餅匣、途利文具匣與詩筒等。¹⁴⁰裝這些東西的作用是：「以便山宿」，「攜之山遊，亦似甚備。」「酒尊」則是遠遊時裝酒的器具，二書中都錄有太極樽與葫蘆樽兩種款式（參見附圖七）。二人咸認為山遊時應當攜以上四物，「束以二架，共作一肩，彼此助我逸興。」¹⁴¹

交通工具亦是「遊具」中的一大類，像是畫舫這類交通工具如前述常成為商人誇富的展示工具，而士大夫為了展示身分也很注意交通工具，晚明的士大夫凡是稍有資財的士大夫，莫不自購游船或畫舫作為旅遊工具，如李日華在其日記中提到的吳貞所，「自號無著居士，以鄉荐授蘭陽令，致政歸，即敕斷家事，以畫舫游江湖間。」¹⁴²但他們走的則是另一條路，強調所謂「雅」的品味。文震亨在《長物志》卷九的卷首就對當時「舟」的形制作一番批評：「舟之習於水也，宏舸連軸，巨艦接鱸，既非素士所能辦；蜻蛉、蚱蜢，不堪起居。」而且還特別指出說：「他如樓船方舟諸式，皆俗。」他指責流行的游船都「不堪起居」或是「皆俗」，那麼他認為是屬於「素士」而用，而且又不落「俗」套的標準是什麼呢？他的標準在形制上的原則如下：「要使軒窗欄檻，儼若精舍，室陳廈饗，靡不咸宜。」而且他還強調在旅遊時使用的功能性與實用性：「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情；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用之訪雪載月，以寫高韻；或芳辰綴賞，或豔女采蓮，或子夜清聲，或中流歌舞，皆人生適意之一端也。」總而言之就是既要「儼若精舍」般的高雅，也要能具備有「登山臨水」、「訪雪載月」的實用性，同時還要有足夠的空間可供歌伎戲班娛樂客人之用。

¹⁴⁰ 途利文具匣中還藏有裁刀、挖耳、挑牙、修指甲等物。詩筒內藏紅葉各箋，以錄詩作用。

¹⁴¹ [明]屠隆，《考槃餘事》，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4，〈遊具箋〉，頁86-90。該卷後來單獨刊行成冊，名之為《遊具雅編》。[明]高濂，《遵生八箋》（成都：巴蜀書社，1988），〈起居安樂箋下·溪山逸游條·游具〉，頁310。

¹⁴²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6，頁365。

晚明其它士大夫也有類似的看法。如陳繼儒在《巖棲幽事》中就提到購置與經營游船，並且強調游船的作用是無論居住或旅遊都是最好的工具：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櫓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菹脯，近則峰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¹⁴³

上述陳繼儒強調的品味與功能性及實用性的說法，和文震亨《長物志》中的看法不謀而合。

在《遵生八箋》、《遊具雅編》與《長物志》三書還都提到「舟」的形制、容量與裝飾。高濂的書中認為「輕舟」的形制：「形如鑿船，長可二丈有餘，頭闊四尺，內容賓主六人，僮僕四人。」而且應分為前、中、後三個船倉，每個倉都有特殊的佈置與功能。他有關前倉的敘述不多，對於中倉他認為要以布幕隔間，內置高級傢俱；後倉則是以藍布裝飾船身，是童僕工作的空間；甚至連船槳都要裝點才行。理想的境界是一邊行舟，一邊起灶煮茶，「起煙一縷，恍若畫圖中一孤航也。」¹⁴⁴屠隆認為理想的「舟」之形制較高濂所云為大：「形如剗，船底惟平，長可二三丈有餘，頭闊五尺」；他還說平時要「別置一小船如葉」，主要的作用並不是在交通，而是在塑造一種有如山水圖畫中間情雅致的情境。¹⁴⁵文震亨對於舟的看法較屠隆更進一步，他認為要分為四倉：前、中、後倉與榻下倉，而且要有更嚴謹的設計裝飾與作用。前倉類似為童僕服務主人的廚房，中倉置傢俱，為賓主娛樂處，後倉為主人書房，至於榻下倉則為置衣櫃與儲藏室。另外，他也指出要置一小船，其作用與屠隆的說法類似，乃為「執竿把釣，弄月吟風」之用；不過，他對

¹⁴³ [明]陳繼儒，《巖棲幽事》，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118（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影印刊行，1995），頁 17b-18a。

¹⁴⁴ [明]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下·溪山逸游條·游具〉，頁 308。

¹⁴⁵ [明]屠隆，《考槃餘事》，卷 4，〈遊具箋〉，頁 87。

小船的裝飾更加講究：「以藍布作一長幔，兩邊走檐，前以二竹為柱，後縛船尾釘兩圈處，一童子刺之。」¹⁴⁶

他們三人關於舟與小船的這種規制與裝飾理論，並不只是個人的空想而已，實際上晚明的士大夫確實有如此實踐者，如王臨亨曾記載道胡氏畫舫的性能：

胡氏以二小艇相維，而施木其上，四圍立柱，以青油幕覆之。几席間插芙蓉殆遍，居然畫舫也。下令放舟水中央，清風徐來，暗香逆鼻，綠葉紅葩，簇簇迎人，似牽遊袂而不捨者。¹⁴⁷

胡氏的畫舫不但符合了屠隆及文震亨的想法，而且還有標新立異之處。因為他注重的不只是功能性，還非常重視裝飾，甚至是香味。

上述的這些方式可以說是士大夫面對商人在遊船方面的競爭所作的對抗，如此一來造成了遊船方面競逐新奇的風尚，甚至還有士大夫自創新的旅遊工具，來表現自己的品味。例如黃汝亨(1558-1626)在〈浮梅檻記〉一文中，敘述他發明了一種新式游船的過程：

客夏游黃山白岳，見竹筏行溪林間，好事者載酒從之，甚適。因想吾家西湖上，湖水清且廣，雅宜此具。歸而與吳德聚謀製之，朱欄青幕，四披之，竟與煙水雲霞通為一席，泠泠如也。¹⁴⁸

他將之稱為「浮梅檻」，並且帶到西湖，造成流行，他還自鳴得意地說：「每花月夜，及澄雪山陰，予時與韻人禪衲尚羊六橋，觀者如堵，俱歎西湖千載以來未有。當時蘇、白風流，亦想不及此人情喜新之談。」他吹噓自己的品味卓越，連蘇東坡與白居易都遠不及他。他知道杭州市民喜好新奇之風尚，所以創造這種新的遊具以吸引眾人的目光。其實這所謂的「浮梅檻」就是一

¹⁴⁶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生活與博物叢書·飲食起居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9，〈舟車〉，頁433-434。

¹⁴⁷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4，〈志遊覽·遊羅浮山記〉，頁102。

¹⁴⁸ [明]黃汝亨，〈浮梅檻記〉，收入[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頁423。

種竹筏而已，倒是這股流行風並不假，就連虞淳熙也說：「山溪處處浮竹筏，古今賢達如許，都不解浮筏於湖，遂令千秋開物名，獨歸貞父。」¹⁴⁹按，貞父乃黃汝亨的字，可見這種遊具的確曾在江南風行一時。

六、代結論：晚明的旅遊消費與現代性

旅遊業(tourism)自二十世紀初之後已成為重要的社會與經濟動力，是世界上重大的產業之一；而且旅遊業的興起也成了現代社會與生活的重大象徵。近年來的研究開始從歷史的角度來探討現代旅遊業的形成，不再認為現代的旅遊業只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而主張其起源應可上溯到「前現代時期」(early modern period)。在西方旅遊風氣最先進的是英國(Britain)，若將晚明的旅遊活動與英國的相比較，更可以凸顯晚明的旅遊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¹⁵⁰

當十六至十八世紀時，英國的國內旅遊(domestic travel)著重的是知識的蒐集，背後明顯地是受愛國主義驅使或是擔負經濟和政治的任務，而享樂主義與舒適性尚未被視為旅遊的主要目的；¹⁵¹相對地，此時期中國的旅遊風氣反而是著重在後者，無論是士大夫或大眾旅遊，以娛樂性與舒適性為目的之旅遊活動遠較知識性的為多，而像《徐霞客遊記》這類書籍所描繪為追求知識的冒險式旅遊，似乎並非當時的主流。

在英國，一直要到十八世紀中產階級茁壯之後，才有更接近類似現代旅遊業的想法；也是在十八世紀中葉，英國才漸漸發展出套裝旅遊(package

¹⁴⁹ [明]虞淳熙，〈浮梅檻詩序〉，頁208。

¹⁵⁰ 有關前現代英國旅遊業(tourism)發展史的研究很多，本文主要根據 Hartmut Berghoff,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Harvie,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00-2000*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一書。

¹⁵¹ Hartmut Berghoff and Barbara Korte,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n Hartmut Berghoff,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Harvie,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00-2000*, pp. 4-5, 9-10; Helga Quadflieg, "Approved Civilities and the Fruits of Peregrination," *ibid.*, pp. 21-45.

tour)。¹⁵²晚明的商人在推動旅遊活動方面，其實也扮演了類似英國中產階級的角色；而且晚明已經出現大眾旅遊，甚至套裝行程也較英國旅遊業的發展更早。

關於旅遊的論述方面，英國也是要到十八世紀之後，才開啓爭論旅行與歡娛關係的新頁；直到該世紀末，旅遊活動是有益還是有害的爭論仍是喋喋不休。而晚明早在十六世紀以後就已出現類似的爭論，而且對旅遊活動與旅遊消費的正面評價也漸漸明朗。

英國的精英階層在面對大眾旅遊業興起時的態度與反應，最明顯的例子是阿爾卑斯山的旅遊，它是浪漫式旅遊(romantic type of travel)者崇尚自然與美景的代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西歐的旅行家以「真」(real)為辭，大肆批評旅遊業帶來的環境破壞，其實背後也是為了區分(distinguish)他們自己與大眾之不同。¹⁵³而類似的現象在晚明也已出現，士大夫提出來的「雅俗」、「遊道」、「遊具」等等，也都是用來區分他們與大眾旅遊不同的說詞。

旅遊的商品化被視為西方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與消費文化(consumer culture)興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¹⁵⁴從晚明旅遊活動的商品化特徵，以及前述的比較與分析可知，中國旅遊歷史的發展實不亞於西歐。再者，消費文化與消費社會形塑了現代西方的觀念與行為，可以說是與西方的現代性(modernity)糾結在一起。據 Don Slater 指出，消費文化具有以下幾個特徵：一、大眾消費的文化；二、市場社會的文化；三、普遍的、非個人的；四、將個人的選擇和生活，與自由(freedom)等同；五、消費者的需要原則上是無限制的、無法滿足的；六、消費文化是尋求認同與身分地位的媒介；七、消費文化表現(represent)出在現代權力運作下文化的重要性。¹⁵⁵晚明的旅遊活

¹⁵² Chloe Chard, "From the Sublime to the Ridiculous: The Anxieties of Sightseeing," *ibid.*, pp. 47-68.

¹⁵³ Hartmut Berghoff and Barbara Korte,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bid.*, pp. 5-6, 9-10.

¹⁵⁴ Hartmut Berghoff, "From Privilege to Community: Modern Tourism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ibid.*, pp. 164-168.

¹⁵⁵ Don Slater,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2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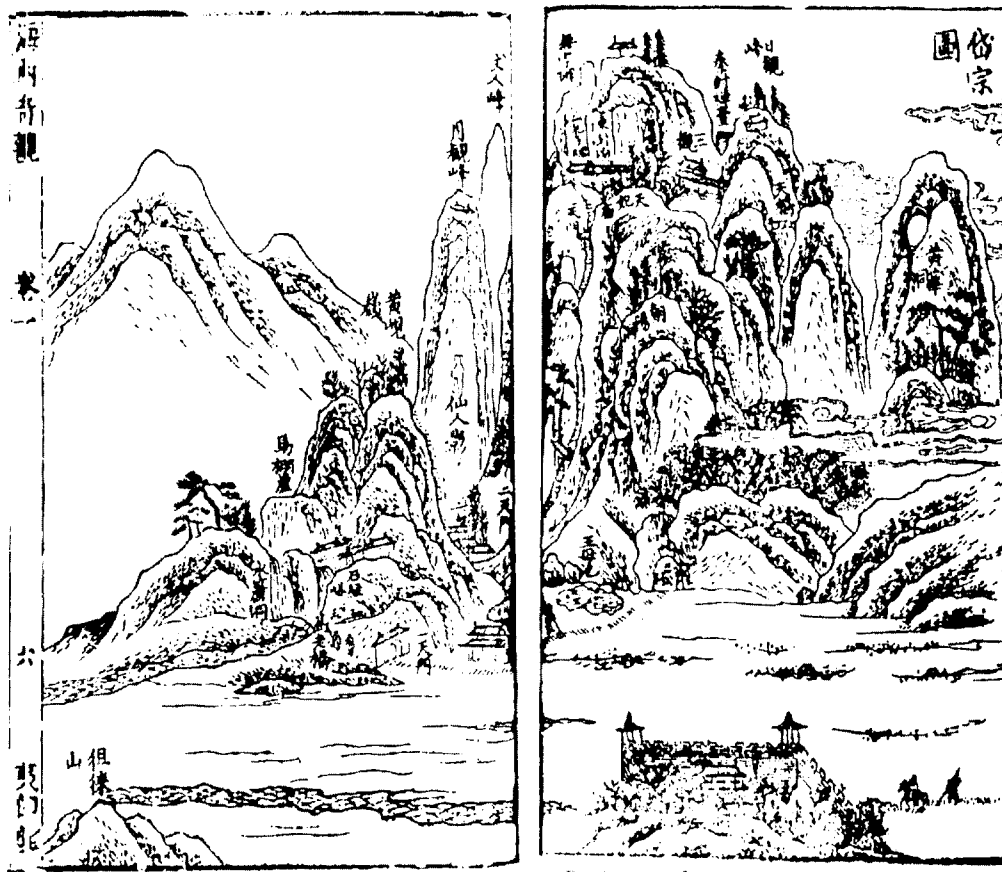
動與消費文化已具備上述中的五點，亦即旅遊消費文化已走向大眾消費的文化，旅遊活動業已成為商品化與市場化，而且由精英分子普及到大眾，統治者已無法用法令來限制旅遊消費者的需求，旅遊文化也成了士大夫特別是下層士人們尋求認同與身分地位的媒介；只是因為傳統文獻無法探討私人選擇與自由的問題，也無現代權力運作的複雜性。由此可見，晚明的旅遊消費文化的確在相當程度上，與現代性的消費文化特點是相吻合的。

本文的目的並非是要論證晚明的中國已經進入或有無「現代性」，而是一則指出消費文化作為西方現代性的指標，並不是西方歷史發展中所獨有的；一則是透過這一層的分析，重新思考中國消費史與消費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休閒消費的力量可能對明清以來歷史發展的影響。

附表

出處 遊具種類	《遵生八箋》	《遊具雅編》	《長物志》
衣履冠飾	竹冠 批雲巾 道服 文履 雲烏 斗笠	笠	道服 笠 履 巾
裝備配件	道扇 拂塵 竹杖 藥籃 坐毯 衣匣 疊桌 備具匣	杖 魚竿 衣匣 疊桌 藥籃 備具匣	坐團 杖
飲食器皿	瘦杯 瘦瓢 葫蘆 提盒 提爐 酒尊	瓢 葫蘆 提盒 提爐 酒尊	瓢
文房器具	棋籃 詩筒葵箋 韻牌 葉箋	葉箋	
交通工具	便輦 輕舟	舟	籃輿 舟 小船
資料來源	〔明〕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下·溪山逸游條·游具〉，頁304-310。	〔明〕屠隆，《考槃餘事》，卷4，〈遊具箋〉，頁86-90。	〔明〕文震亨，《長物志》，卷7，〈器具〉，頁426-427；卷8，〈衣飾〉，頁432-433；卷9，〈舟車〉，頁433-434。

附圖一：《新鐫海內奇觀》附圖



資料來源：〔明〕楊爾曾，《新鐫海內奇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7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夷白堂刻本影印，1997），卷1，頁5-6。

附圖二：登山旅遊時應雇的肩輿與舁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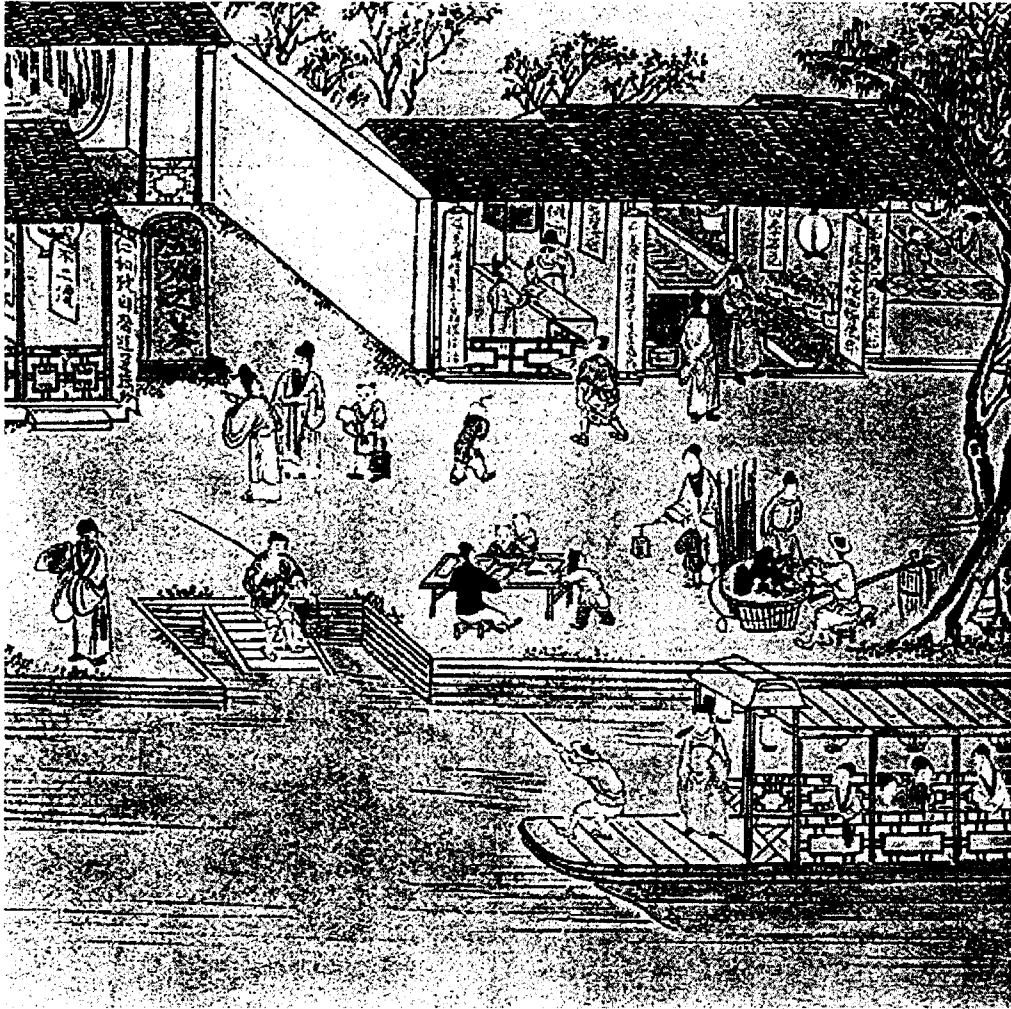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明〕張宏，《石屑山圖》局部（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採自高居翰（James Cahill）著，李佩樺等初譯，《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台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26。

附圖三：登山旅遊時應雇的肩輿與舁夫二



資料來源：〔明〕陸治（1469-1576），《支硎山圖》局部。採自高居翰著，李佩樺等初譯，《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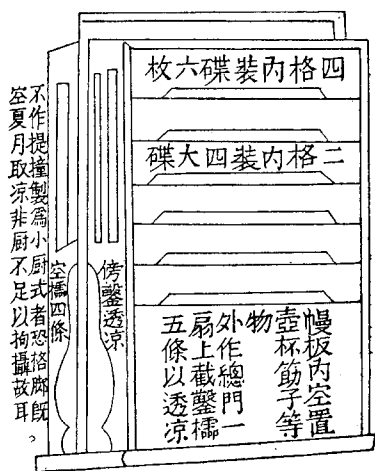
附圖四：畫舫圖



資料來源：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VI^e Section,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1964), Album, fig. 25.

附圖五：提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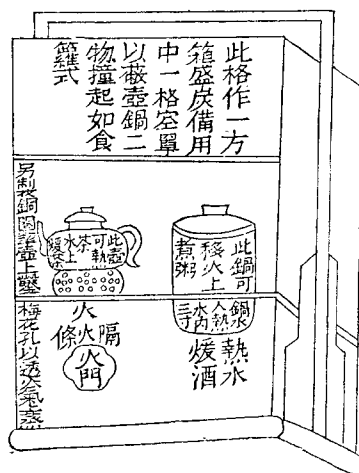
式圖合提遊山



資料來源：〔明〕屠隆，《考槃餘事》，卷4，〈遊具箋〉，頁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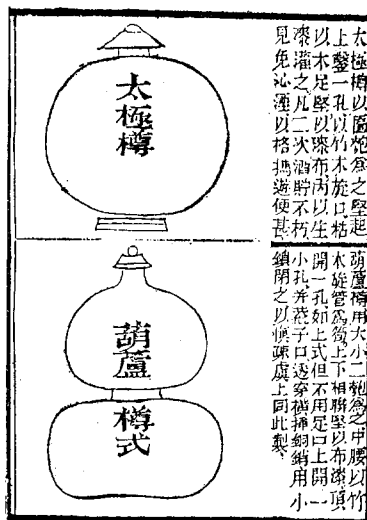
附圖六：提爐圖

八圖爐提



資料來源：〔明〕屠隆，《考槃餘事》，卷4，〈遊具箋〉，頁94。

附圖七：酒尊圖



資料來源：〔明〕高濂，《遵生八箋》，〈起居安樂箋下·溪山逸游條·游具〉，頁313。

附圖八：〔清〕徐揚《姑蘇繁華圖》中之肩輿與提盒圖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明〕文元發，《學圃齋隨筆》。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 〔明〕文震亨，《長物志》，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生活與博物叢書·飲食起居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明〕方岳貢修，陳繼儒纂，崇禎《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崇禎三年刻本影印，1991。
- 〔明〕牛若麟修，王煥如纂，崇禎《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15-19。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崇禎刊本影印，1990。
- 〔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王思任，《王季重雜著》。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7。
- 〔明〕王誥、劉雨纂修，正德《江寧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冊 2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正德刻本影印，1988。
- 〔明〕王臨亨，《粵劍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王穉登，《吳社編》，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4 冊 6。台北：新興書局，1970。
-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明〕田藝蘅，《香宇續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明嘉靖刊本景照。
-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台北：廣文書局，1991。
- 〔明〕江盈科著，黃仁生輯校，《江盈科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
-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明正德刊本影印出版，1967。

- 〔明〕宋濂，《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明〕李流芳，《檀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5。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
-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沈愷著，《環溪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92。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影印出版，1997。
- 〔明〕周世昌撰，萬曆《崑山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蘇省》，號 433。台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四年刊本影印，1983。
- 〔明〕周暉，《二續金陵瑣事》，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16 冊 4。台北：新興書局，1977。
- 〔明〕林世遠纂修，正德《姑蘇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冊 26-27。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正德元年嘉靖續修本影印，1988。
- 〔明〕林雲程修，沈明臣等纂，萬曆《通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 10。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影印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明萬曆六年刻本重印，1996。
- 〔明〕姚希孟，《循滄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冊 251。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張叔籟陶蘭台刻清閼全集本影印，1996。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29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
- 〔明〕徐弘祖著，褚紹唐與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明〕高濂，《遵生八箋》。成都：巴蜀書社，1988。
- 〔明〕屠隆，《考槃餘事》，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 〔明〕張大復，《梅花草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1995。
- 〔明〕張岱，《陶菴夢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明〕張岱，《瑯嬛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
- 〔明〕張德夫修，皇甫汈等纂，隆慶《長洲縣志》，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冊 23。上海：上海書店據隆慶五年刻本影印，1990。
-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明〕陳繼儒，《陳眉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冊 138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史兆斗刻本影印，1995。
- 〔明〕陳繼儒，《巖棲幽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118。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影印刊行，1995。
- 〔明〕陸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陸楫，《蒹葭堂稿》，嘉靖四十五年陸氏家刊本。
- 〔明〕費元祿，《鼉采館清課》，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14 冊 4。台北：新興書局，1988。
- 〔明〕黃省曾，《吳風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6 冊 5。台北：新興書局，1989。
- 〔明〕楊循吉，《燈窗末藝》，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43。

-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人文集叢刊影印明鈔本，1997。
- 〔明〕楊爾曾，《新鐫海內奇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冊 72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明萬曆夷白堂刻本影印，1997。
- 〔明〕葉權，《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明〕鄒迪光，《鬱儀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158。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1997。
- 〔明〕鄒迪光，《始青閣稿》，收入《四庫全書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103。
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天啓刻本影印，2000。
- 〔明〕鄭材，《悅偃齋文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刊本。
- 〔明〕錢希言，《松樞十九山》，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序刊本影印。
- 〔明〕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明〕戴澳，《杜曲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明崇禎年間刊本景照。
- 〔明〕謝肇淛，《五雜俎》。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 〔明〕謝肇淛，《小草齋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76。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刻本配鈔本影印，1997。
- 〔明〕歸莊，《歸莊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明〕譚元春著，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清〕沈世奕撰，康熙《蘇州府志》。台北：漢學研究中心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康熙二十二年序刊本景照。
- 〔清〕唐仲冕編，《六如居士外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冊 262。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據昭代叢書排印，1989。
- 〔清〕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編 40 冊 3。台北：新興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佛蘭草堂手鈔本影印，1990。
-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 〔清〕張鴻、來汝緣修，王學浩等纂，道光《崑山新陽兩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冊1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道光六年刻本影印，1991。
- 〔清〕郭廷弼修，周建鼎等纂，康熙《松江府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刊本。

二、專書

- 朱劍心選注，《晚明小品選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
- 施蜚存編，《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書店，1984。
- 高居翰(James Cahill)著，李佩樺等初譯，《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台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
- 陳萬益，《晚明小品文與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
- 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冊4。上海：中華書局，1924。
- 黃卓越輯，《閑雅小品集觀——明清文人小品五十家》，冊上。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 楊正泰校注，《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太原：山西出版社，1992。
- 楊正泰編撰，《明代驛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鄭焱，《中國旅遊發展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 Appadurai, Arjun,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erghoff, Hartmut, Barbara Korte, Ralf Schneider, and Christopher Harvie, eds. *The Making of Modern Tourism: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rience, 1600-2000*.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Dermigny, Louis.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VI^e Section,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1964.

Naquin, Susan, and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later, Don.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三、論文

毛文芳，〈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期3，2000年9月。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吳智和，〈明人山水休閒生活〉，《漢學研究》，卷20期1，2002年6月。

巫仁恕，〈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4，2000年12月。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國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紐約：哥倫比亞大學，2002年10月。

巫仁恕，〈明代士大夫與轎子文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8，2002年12月。

周振鶴，〈從明人文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台北：漢學研究中心、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0年4月。

林皎宏，〈晚明黃山旅遊的興起〉，《史原》，期19，1993年10月。

林麗月，〈晚明「崇奢」思想隅論〉，《台灣師大歷史學報》，期19，1991

年 6 月。

- 林麗月，〈《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台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
-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
- 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碩士論文，2000。
- 陳建勤，〈明清時期的旅遊消費及其支出——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消費經濟》，期 4，2000。
- 陳建勤，〈論「游道」——明清文士旅遊觀研究之一〉，《旅遊月刊》，期 4，2000 年 8 月。
- 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卷 5 期 2，1994 年 6 月。
- 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4，1997。
- 宮崎市定，〈明清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收入氏著之《アジア史研究》，輯 4。東京：岩波書店，1964。
-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編，《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
- 濱島敦俊，〈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

Travel and Consumption Culture in Late M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Jiangnan Region

Wu Jen-Shu*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vel and the consumer culture that surrounded it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By this time, travel had become commercialized and market-oriented, as seen in the increasing composi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ravel books, new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nd the thriving business of providing lodgings. Tourist guides and package tours demonstrate that travel became a new fashion that was widespread not only among upper and lower gentry, but also included travel for pleasure by commoners. Moreover, traveler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comfort, which thus also marks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ravel during late Ming.

The new fashion for travel gave rise to an important debate. Although some gentry criticized it as a wasteful and decadent form of consumption, others noted its useful economic effects.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ntalities of the late-Ming gentry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discourse about travel. Some gentry clearly associated travel with social status, and sought to define new tastes in travel that would distinguish their travel culture from that of commoners. Taken as a whol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ourism specifically and a consumer society more broadly developed in China at least as early as in Western Europe, if not earlier. Furthermore, some feature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of travel during late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Ming indeed correspond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 cultu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modernity.”

Keywords: travel, late Ming, consumption, fashion, taste, modernity